臺大歷史學報第 48 期
2011 年 12 月，頁 97-163

BIBLID1012-8514（2011）48p.97-163
2011.10.21 收稿，2012.1.13 通過刊登

觀察美國——臺灣菁英筆下的美國形象與教育交換計畫，1950-1970

趙　綺　娜*

提　要

從 1950 到 1960 年代，有三千多位臺灣人曾經接受美國政府邀請赴美訪問。本研究找到十四位曾寫下當時訪美見聞或回憶錄者，來探究當時他們訪美的經驗，並分析他們如何解讀美國文化？美國政府邀訪目的是否達成？

本文認為，以國家宣傳而言，美國政府之邀訪大致是成功的。將臺灣受邀者所描述的美國形象，與當時美國政府對海外宣傳的自我形象相對照，發現差異不大。臺灣訪客參訪回來之後，多半對美國懷有正面印象。不過，臺灣訪客觀察美國會受到自身的文化背景與經驗的影響，因此他們解讀美國社會、文化有時會產生曲解或誤解。

關鍵詞：教育交換　冷戰　美國公共外交　美臺關係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enachao@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美國在臺灣的教育交換活動
三、訪美見聞
四、受邀者眼中的美國
五、對美國整體印象與美國政府的期望之比較
六、結論

一、前言

1950 到 1960 年代，大約有 3000 多名臺灣人透過「教育交換」（educational exchange）方式，到美國參觀、訪問或受訓。這些人通常是由美國駐在臺灣的大使館挑選的臺灣社會菁英，或是在美援計畫下經過公開甄試的技術人員、教師和青年學生，他們赴美後由美國政府相關業務部門接待，時間從一個月到一年不等，費用完全由美國政府負擔。

什麼是「教育交換」？「教育交換」一詞衍生自美國國會 1948 年通過的《美國新聞與教育交換法案》（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也就是《史墨法案》（The Smith-Mundt Act）。「教育交換」其實就是指文化交流。[1]該法案緣起於 1946 及 1947 年間，美國許多國會議員到歐洲考察戰後美國在海外的聲望，在考察過程中，他們驚訝地發現蘇俄在歐洲正進行強勁的文化宣傳活動，也感覺到歐洲人對美國普遍缺乏了解。一般歐洲人對美國的認知是透過好萊塢的鏡頭，而知識分子與政府官員則對美國文化與社會普遍存有誤解與偏見。

1 雖然「教育交換」一詞的意義比「文化交流」狹窄，但是在 1948 年，「教育交換」一詞顯然比「文化交流」一詞更能為美國國會議員所接受。見 Charles A. Thomson and Walter H. C.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67.「教育交換」成為戰後美國文化外交的工具，見 Liping Bu,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3:3 (December 1999, London), pp. 393-3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美國國會議員擔心歐洲人對美國的誤解，會讓他們輕易地接受共產黨對美國誣蔑抹黑的宣傳。為了對抗共黨在歐洲的文宣攻勢，美國國會在 1948 年 1 月通過《史墨法案》。[2]

《史墨法案》是個冷戰時代的產物。它是美國有史以來國會第一次在和平時期，授權聯邦政府運用所有的教育、新聞和宣傳的資源，在海外進行文化與心理戰。依據此法案，美國政府可以利用人員交換、雜誌、影片、美國新聞處圖書館、演講和「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等宣揚美國的理想與生活方式，爭取外國人民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1948-1952 年期間，在國務院主管教育交換事務的詹士敦（William C. Johnstone）就曾表示，教育交換計畫「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有效的武器或工具。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說，這個工作就是把一套思想或事實，放進一個人的腦袋裡。當我們成功地完成這件事，就會產生有利於美國外交政策的結果。它可以有助於團結自由國家，邁向和平之路」。[3]事實上，許多美國官員認為各種交換計畫是增進美國在海外影響力最有效的工具，它們看起來是最沒有「宣傳味的」（“propagandistic”），不但可以改變外國人對美國的態度，更提供了美國政府直接接觸第三世界菁英分子的管道。[4]這些計畫雖然標榜「交換」、「合作」與「互相了解」，其實從動機、經費、運作和影響各方面來看，幾乎都是美國主動地單向輸出美國文化，塑造美國正面形象，而不是真正與外國文化進行對等的雙向交流。[5]

---

2 Philip H. 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4), pp. 30-34; Thomson and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p. 65-69; Frank A. Ninkovich,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96), pp. 17-20.

3 轉引自 Thomson and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84.

4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pp. 304-305.

5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歐美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臺北），頁 122；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國為何在二次大戰以後擔心世人不了解美國，而急於爭取外國人對美國懷抱好感？原來美國人認為民主陣營與蘇聯共產集團的冷戰，不只是一種國際政治權力的鬥爭，也是兩種不同信仰系統、制度及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爭取民心的鬥爭（battle for the mind）。為了圍堵共產勢力向外擴張，身為民主集團龍頭老大的美國，除了給予盟邦軍事、經濟與技術援助之外，還要加強彼此文化、社會的交流，增進雙方了解，更重要的是要說服世界各國的人民：美國的制度與文化比共產制度優越。只有美國文化爭取到海外人民的認同，才能避免他們接受共產思想宣傳，保持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因此美國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也就是美國政府爭取外國人民對美國產生好感的外交工作，是對抗共產集團的冷戰戰略之一。[6]

過去學界討論美國冷戰時期公共外交，多集中於《史墨法案》中的新聞部分，也就是宣傳（propaganda）活動。[7]他們著眼於美國政府為何與如何制訂宣傳政策，例如美國新聞總署的建置、華府如何利用媒體為美國做公共關係、美國要塑造什麼樣的美國形象等等。[8]近年來也有學者

---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91.

6 有關 public diplomacy 的定義，可見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pp. xiv-xvi.

7 在 1950、1960 年代，美國決策官員對「新聞」與「宣傳」兩詞是互相交換使用。他們知道「宣傳」與「心戰」等字眼的負面意義，所以在公開場合，他們總是形容所從事的是「新聞」活動。見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p. 7.

8 早期的研究有 Thomson and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arles Frankel,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Abroad*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6). 新的研究有 Reinhold Wagnleitner, *Coca-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ustri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Frank A. Ninkovich,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開始從教育交換的角度來討論美國文化輸出的現象，但這些研究還是以美國檔案為主，探討美國為何、如何對外國進行其教育交換活動。[9]相較之下，從接受端（receiving end），也就是從接受美國文化宣傳的外國人的角度，來探討他們如何解讀（interpret）美國文化的著作並不算多。然而 1990 年以來，已有一些學者開始檢討二次大戰以後，歐洲人對於美國文化攻勢的反應。他們不再接受從 1960 年代以來美國對海外進行「文化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Korea, 1945-195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1 (February 2003; Ann Arbor), pp. 71-99; Marc Frey, "Tools of Empire: Persuas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s Modernizing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 *Diplomatic History* 27:4 (September 2003, Malden), pp. 543-568.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一書中所謂 total war，是指艾森豪總統時代把冷戰視為一種世界戰爭，要動用全國的資源來對全世界進行意識形態的戰爭，而本書主要是討論美國如何影響「自由世界」的輿論，而不是對蘇聯的心戰活動；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主要是討論美國宣傳官員如何規劃對海外宣傳美國的形象。S. R. Joey Long,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U.S.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in Singapore, 1955-1961," *Diplomatic History* 32:5 (November 2008, Malden), pp. 899-930;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ndrew L. Yarrow, "Selling a New Vision of America to the World: Changing Messages in Early U.S. Cold War Print Propagand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1:4 (Fall 2009, Cambridge, MA), pp. 3-45. 這些著作幾乎都是討論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如何及為何制定對外國宣傳政策，或是美國對外宣傳是要將美國塑造成什麼樣的形象。

9 例如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pp. 304-310；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歐美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頁 79-127；Giles Scott-Smith, *Networks of Empire: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Foreign Leader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 France, and Britain, 1950-70* (Brussels: Peter Lang, 2008). 只有 Liping Bu, *Making the World Like Us: Education, Cultural Expansio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是從二十世紀美國文化向海外擴展之角度，探討美國教育交換活動。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認為美國長期進行教育交換活動是蘇聯政權最後崩潰的因素之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帝國主義」的說法，而是強調接受者的能動性與選擇性。[10]

從臺灣與美國的文化關係脈絡來看，過去有關美國對臺灣的影響的研究，大部分是討論美援對臺灣經濟和醫療制度的影響。[11]本研究將利用當年受邀參觀訪問美國的臺灣菁英的著作來探討他們（也就是接受者）如何接觸美國文化，美國政府如何接待他們？美國政府是否使臺灣社會菁英產生對美國良好的印象，進而透過他們在臺灣建立美國正面的形象？他們如何解讀美國文化？在這些當時臺灣社會菁英眼中，美國是什麼樣子？受邀之訪客不只觀察美國，他們也從個人的角度解讀所看到的美國社會的各種現象。

---

10 例如 Rob Kroes, "American Empire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A View from the Receiving End," *Diplomatic History* 23:3 (Summer 1990, Malden), pp. 463-477. 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一書就指出歐洲人並沒有被美國化。Reinhold Wagnleitner 的 *Coca-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則指出，奧地利人並不是被動地接受所有美國文化產品，他們熱烈接受美國的大眾文化，對美國文化官員大力推銷的美國「高級文化」卻不捧場，所以在奧地利，搖滾樂歌手貓王普利斯萊（Elvis Presley）遠比美國古典音樂作曲家科普蘭（Aaron Copland）更受歡迎。Jessica C. E. Gienow-Hecht, "Shame on U.S.? Academic, Cultural Transfer, 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 *Diplomatic History* 24:3 (Summer 2000, Malden), pp. 465-494 一文對此議題有一回顧性的檢討。

11 例如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臺北：自立晚報社，1990）；吳聰敏，〈美援與臺灣的經濟發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88，臺北），頁 145-158; Denis Fred Simon, "External Incorporation and Internal Reform," in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ed. Edwin A.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 pp. 138-150; 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一九六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2 期（1998 年 12 月，臺北），頁 39-82；楊翠華，〈美援技術援助：戰後臺灣工業化開端的一個側面〉，收入陳永發主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楊翠華，〈美援對台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2 期（2008 年 12 月，臺北），頁 91-139。單德興則從文化外交角度來討論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譯叢對香港、臺灣文學發展的影響，參見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收入氏著，《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出版社，2009），頁 117-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美國在臺灣的教育交換活動

美國政府邀訪臺灣人的活動，主要依據三種相關法案：《傅爾布萊特教育交換法案》（Fulbright Act）、《史墨法案》和《共同安全法案》（以下簡稱美援）。[12]這三種法案在臺灣開始實行的時間並不一致，美援自 1951 年到 1965 年截止；《史墨法案》之教育交換從 1952 年開始進行，而《傅爾布萊特法案》是在 1958 年才實施。就性質來說，美援部分分成軍事援助與經濟、科學、技術方面之人員訓練，《傅爾布萊特法案》注重學術、教育界之人員交換。而在《史墨法案》下，美國政府則設計各式各樣的計畫，例如「領袖」（Leaders）與「專家」（Specialists）二專案是美國與臺灣社會菁英建立良好關係的主要工具。另外還有教師（Teachers）、學生（Students）、講師及研究學者（Lecturers and Research Scholars）等類別，可以透過公開甄選的方式或邀請臺灣社會菁英赴美參訪。1961 年，《傅爾布萊特法案》與《史墨法案》整合為一（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 of 1961），《史墨法案》的各種教育交換，如「領袖」、「專家」等專案，被合併成「國際訪客」計畫

12 美援是源自 1948 年 4 月 3 日通過的「1948 年援外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48）中第四章（Title IV）的「1948 年援華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與歐洲復興計畫屬於同一法案。這個援華法案在 1951 年由共同安全法案取代，其中負責執行經援的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ECA, Mission to China）改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 [MSA], Mission to China）。1953 年 8 月，共同安全總署改名為國外業務總署（Foreign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FOA）；1955 年 7 月，又再改名為國際合作總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CA），1961 年又再改名為國際開發總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有些討論美國經援臺灣的論文，將美援機構簡稱為 AID，其實只有 1961 年以後的美援機構才可稱之為 AID，1950 年代的美援機構應該以 MSA, FOA 或 ICA 表示才符合史實。參考 Thomson and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p. 92-93, 112；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 271-272。共同安全法案的軍援部分則是由美國國防部與在臺美軍軍事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MAAG）負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rnational visitor program）。此外，軍事人員的交換還是由國防部經費支應。[13]

無論是「傅爾布萊特學者」、「領袖」與「專家」專案的受邀者，教師、學生、研究學者，或在美援計畫下赴美受訓的實習者，都是臺灣當時或未來的政治、社會菁英分子。美國政府希望透過他們與美國社會直接接觸，讓他們接受並將美國文化傳播於臺灣社會，也就是使其成為美國理想或美國生活方式的傳播與宣揚者。因此美國大使館挑選訪美人士的主要標準，就在於他們回國後是否能可靠（sound）並有效地對臺灣人民宣揚與傳遞美國制度、文化、理念的優點。[14]

以「領袖」身分訪美時間是兩個月，「專家」則是四個月。兩者的差別在於以「領袖」身分受邀者，多半是各國政要，或該國負有重任之領導人物，不能久離職守，所以訪問期間僅為兩個月。專家則包含範圍極廣，可以是大學教授、新聞記者、作家、藝術家，以及有較充裕時間到國外訪問的專業人士。當時受邀者多是臺灣的黨、政決策者（如中央、地方政府高層官員與國民黨高層幹部），和社會上的意見領袖（如新聞記者，企業、婦女、文化界領袖人物，以及大學教授）。不過，在實際執行時，「領袖」或「專家」的定義並不嚴謹，兩種身分是可以互換的。[15]

此外，為了加強臺灣人民接觸美國資訊的能力，培養合格的英語教師與改進臺灣英語教學方法也被美國政府視為是教育交換中不可或缺的重大活動。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時代（1953-1961）就已經鎖定外國英語教師為傳播美國反共意識形態的主要工具之一。[16]從 1952 到 1957 年為止，美國國務院利用《史墨法案》之經費，

13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頁 91、95；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p. 305.

14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頁 100-101。

15 例如擁有立法委員身分的作家陳紀瀅就指出，美國方面最初是屬意以領袖名義邀請他訪美的。後來因為他不願意走馬看花，經歷匆忙的旅行生活，才改成以「專家」名義應邀訪美。陳紀瀅，《美國訪問》（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65），頁 21。

16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pp. 307-3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續挑選了 26 名臺灣中學英語教師赴美國大學受訓三個月，然後安排他們在美國各地參觀旅行，以了解美國學校系統之運作和教學的方法。[17]

以教育交換方式赴美的外國人選，通常由兩種方式產生。一是由美國大使館主動出面邀請的「專家」、「領袖」或「國際訪客」；另一種赴美受訓或深造者，則由美國駐在外國的大使館、美國新聞處與美援單位代表組成委員會與我國政府諮商之後，經過考試、甄選產生，向華府提出推薦名單，經過相關單位審核同意後，再由美國政府各個相關的業務部門安排參訪、受訓與深造。[18]一般而言，軍事方面的訪客或深造者皆由國防部負責接待，透過美援管道的經濟、技術方面的訪客或受訓者（如高玉樹、楊基銓），則是由共同安全總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 MSA），以後由國際合作總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CA）負責安排。[19]如與政治、新聞媒體、經濟事務有關的訪客，則是由國務院委託的民間團體政府事務社（Government Affairs Institute）負責安排。如與教育、文化有關的訪客，則由國務院委託民間機構美國教育

17 "Survey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Part VII—Formosa," December 6, 1957, CU Records。CU Records 係指存放在美國阿肯色大學（University of Arkansas, Fayetteville 校區）圖書館所收藏的美國國務院的教育與文化事務局之歷史檔案（The Historical Collection of the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該單位在 1959 年 7 月成立，原隸屬國務院，1978 年改隸美國新聞總署（U.S. Information Agency）。在美國政府內，該單位一般被簡稱為 CU（見 Charles Frankel,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p. 11）。本文將該檔案簡稱為 CU Records。

18 例如"Educational Exchange: Semiannual Report," Taipei Desp.184, October 6, 1960, 511.933/10-660,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例如高玉樹（美援技術協助）、楊基銓（美援技術協助）、齊邦媛（中學英文教師）、雷穎（兵工）、葉昌桐（海軍）等人是經過我國政府與美援單位考試、甄選出來的。王昇，《訪美散記》（臺北：青年戰士報社，1956），頁 2；王昇，《訪美紀行》（臺北：中華日報社，1970 第四版），頁 1；雷穎，《造化遊戲四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 49；鄧克雄、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頁 70、98、129。至於更詳細的資訊，請參考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頁 94-100。

19 有關美援負責機構名稱之改變，參見註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署（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負責安排。[20]

非軍事事務的訪客或受訓者來美後，通常會參加一項美國國情介紹的活動。例如高玉樹與楊基銓在 1951 年赴美受訓時，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特別委託一家「羅德顧問公司」，為這一批從臺灣到美國受訓的 36 位技術人員，在芝加哥莫里遜飯店安排一星期的「美國生活必知的講習。……從美國的國情開始介紹，也對民主政治的定義和實況，作深入淺出的解釋，同時，對美國的工商業和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哲學觀念及如何與美國人相處等實際問題，逐一介紹，讓我們初臨斯土的外邦人有所了解，知所適應」。[21]另外，據 1961-1962 年訪美的陳紀瀅記載，美國教育總署會讓訪客先到華府報到，然後再由該機構的「領袖與專家委員會」（Committee on Leaders and Specialists, CLS）依訪客的興趣與需求安排參訪行程。在訪客尚未到美國各地進行訪問之前，由華盛頓國際中心（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Center）負責一周的課程，介紹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社會等概況，同時它也負責引導訪客參觀華府名勝及風景區，舉辦各種交誼性的活動，使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彼此聯歡。齊邦媛、林海音、侯斌彥、陳紀瀅都曾提到他們到華府報到之後，參加國際中心約十天有關美國國情簡報的經驗。[22]高玉樹回憶當年他參加一星期的講習的印象：「當時以鄉下初來這種高度近代文明國家，尤其是已經踏進政治圈的年青筆者，實在是張目咋舌，感動萬分。」[23]由此可見，這個看似善意的參訪前美國國情講習或簡報，其實已發揮了對新來

20 陳紀瀅，《美國訪問》，頁 25-26。見關吉玉，《訪美見聞》（臺北：經濟研究社，1960），頁 2；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文化，1991），頁 99-100。

21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臺北：臺灣東方出版社，2001），頁 83-84；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心中有主常懷恩》（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 223-224。

22 陳紀瀅，《美國訪問》，頁 25-39。根據陳紀瀅在本書中所記載，華盛頓國際中心在 1950 年創立，接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有一固定辦公大樓麥里地安大廈（Meridian House）和常年經費。見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9），頁 356-357；林海音，《作客美國》（臺北：文星書店，1966），頁 186-187；侯斌彥，《美國行》（高雄：臺灣新聞報社，1966），頁 34-36。

23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訪客宣傳的作用。

除了美國國情簡介之外，美國政府為來訪客人安排參訪旅程的重要原則就是自由旅行（freedom of travel）。曾任政府事務社社長的馬因（Dean Mahin）在 1967 年就表示：「我們相信訪客應該自由自在地對我們社會的性質得到他自己的結論。我們覺得維持自由選擇和行動自由的原則至關重要（vitally important），因為我們最終目標之一就在彰顯一個自由開放社會的概念。」[24]然而，表面上看起來美方好像是依照訪客的意願安排參訪的節目與行程，但其實除了個人行動之外，還有美方人員建議造訪的人士與地方，並由美方人員代為安排接洽各地的接待。比對幾種訪美見聞錄，可以看到參訪行程中除了華府及附近的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動物園之外，有一些共同必訪之地，例如田納西谷水利建設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底特律的汽車裝配廠、鋼鐵廠與煉鋼廠。對種族關係有興趣者，一定會被安排訪問紐奧爾良（New Orleans）的黑人活動中心都市同盟（Urban League）及天主教專為黑人創辦的撒維爾大學（Xavier University）等。[25]

美國軍援部分的教育交換計畫，除了傳授軍事專業技術與制度之外，也有宣揚美國文化，團結自由世界之政治意圖。例如美國海軍在 1956 年成立海軍指揮學院（Naval Command College）的原始目標之一，就是「讓自由國家派訓的軍官多瞭解美國」。美國政府每年讓自由國家派遣一名「具有發展潛力」的海軍上、中校級軍官到該學院集中受訓，一方面「可以使他們瞭解美國文化，並學習其先進的戰術及戰略思想。另一方面，這些軍官經過朝夕相處的受訓生活，可以產生同志般的情感，將來回到各自的國家更可促進自由國家間的認識和交流，並可達到和諧相處、消除歧見的境界」。前海軍總司令葉昌桐上將曾在 1967 年到海軍指

24 轉引自 Giles Scott-Smith, *Networks of Empire*, p. 96.

25 曾虛白，《東遊散記：遊美見聞錄》（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頁 133-141；陳紀瀅，《美國訪問》，頁 913-916；吳魯芹，《美國去來》（臺北：中興文學出版社，1953），頁 39；王昇，《訪美紀行》，頁 40-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揮學院受訓一年。最令葉氏懷念的就是學校安排的三次工業、文化、軍事校外教學，即「參謀旅行」，由美國海軍派專機全程伴隨行動。當時該學院除了安排訪問軍事基地之外，也帶他們去參觀美國具「代表性」的汽車工業裝配線及鋼鐵工廠、鋁業公司，另外還去參觀美國著名的博物館，到紐奧爾良、拉斯維加斯（Las Vegas）等地體驗美國不同的都市生活。[26]

從外國參訪者行程的安排，可見美方運作方式之細膩，每個個案都經過精心設計，以期達到最好的薰陶與宣傳效果。例如王昇在 1955 年受邀訪問時，原預期美國方面會趁他赴美參訪時，與他討論美國政府一向強力反對的國軍政工制度，結果美國政府隻字未提。美國人除了讓王昇參觀美國軍事學校與部隊，還帶他們參觀煉鋼廠、汽車製造廠、華盛頓紀念碑及華盛頓家園，與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動物園等公共設施，以及大型音樂、舞蹈表演等場所；除此之外，美方並未特別安排其他節目。美國人顯然希望王昇親身感受美國自由、民主政治的運作，見識美國的富強，進而認同美國文化價值，並未直接向他說教或批評臺灣方面做法的不是。王昇回臺之後，認為美國政府的做法「相當高明」。[27] 1956 年以中學教師身分赴美接受英語教學訓練的齊邦媛，被安排住在密西根大學生物系惠勒（Albert Wheeler）教授家中，體驗「美國生活方式」。惠勒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在密西根州的最早紮根奠基者，1960 年代曾為諾貝爾生物獎候選人，1970 年代還曾擔任過安那堡（Ann Arbor）市長，該市有一座公園後來以他名字命名。齊氏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國高文化的黑人家庭。」[28]她雖未描述惠勒夫婦與她討論黑白種族問題的內容，但可看出美國政府刻意安排美國黑人領袖家庭接待外國英語教師的用意，在於展示美國黑人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不輸給白人之印象。

---

26 鄧克雄、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頁 130-133、137-138、140-142。

27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頁 212、321-322。

28 齊邦媛，《巨流河》，頁 3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國對臺灣的教育、文化交換活動的主要邀訪對象，包括臺灣的黨、政決策者，以及社會上各種意見領袖及年輕學生，也就是現在或未來的臺灣領袖人物。他們不但是在臺灣傳播美國文化的主要媒介，也是左右臺灣當前與未來走向的關鍵人物。美國政府透過教育交換活動邀請他們訪美，不僅可以增進他們對美國文化、制度的了解，也指望訪美的領袖人士可以把在美國所觀察、學習到的新知識、方法、理念，在臺灣付諸實施。[29]例如 1953 年秋美國政府邀請蔣經國訪美，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接見蔣經國時，就曾特別建議蔣氏觀察美國政府處理顛覆、叛國及安全問題時，如何在不侵犯基本人權和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下對待嫌犯，希望蔣氏以後能採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臺灣的國家安全事務。[30]

從美國駐臺大使館歷年度報告中，可以看出美國官員自認送人到美國訪問、受訓或深造，對於影響臺灣社會、文化、政治成效卓著。例如 1956 年 10 月一份臺北美國大使館向國務院報告有關臺灣英語教師赴美

29 例如"Educational Exchange: Semiannual Report," Taipei Desp.167, October 18, 1956, 511.933/10-1856, Folder 25, Box 316, CU Records.

30 見 Memorandum for the files b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Walter McConaughy, November 13, 1953,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 14, pt. 1, pp. 251-253, 見 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cgi-bin/FRUS/FRUS-idx?type=gallery&entity=FRUS.FRUS195254v14p1.p0281&id=FRUS.FRUS195254v14p1&posn=curr&curr=FRUS.FRUS195254v14p1.p0281&isize=M&q1=251 (accessed March 10, 2009). 又見傅建中，〈蔣經國會晤杜勒的插曲〉，《傳記文學》第 66 卷第 4 期（1995 年 4 月，臺北），頁 81-82。當年隨蔣訪美的沈錡（1917-2004）認為，這次訪美對早年受蘇聯教育的蔣經國而言，「算是上了真正民主政治的一課，這與他日後出任總統時，開放報禁黨禁，取消戒嚴，准許國民赴大陸探親，最後在他臨終之前，把中華民國推上民主政治的大道，有著絕對良好的關係」。見沈錡，〈隨經國先生訪美記（五）〉，《傳記文學》第 66 卷第 4 期（1995 年 4 月，臺北），頁 80。另外，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1898-1991）引述一位我政府官員在聆聽過蔣氏回國後於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說的評語，指出邀請蔣氏訪美，「是貴國政府在此地所做的最好投資」。見 "Semi-annual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Desp.438, February 2, 1954, 511.94a3/2-254, Folder 25, Box 316, CU Record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受訓的成果中指出：「他們是教育交換活動中最熱心宣傳美國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人。他們在美國受訓期間有機會結識許多『普通』的美國人。一般而言，這些美國人對中國客人親切、殷勤，對其所代表的國家也很有興趣。他們提供這些教師一個觀察美國人如何生活、工作，如何教養孩子的機會。英語教師在美國生活經驗所合成的美國印象是一個『友善、勤奮、愛好自由的國家』。他們回臺之後，會將這些印象傳遞給他們的學生。」[31]美國駐華官員認為，一般曾經受邀訪問美國的人之視野，都因為訪美時所獲得的新思想、新觀念而擴大。他們訪美回來之後，幾乎都比以前更為了解美國事物，對美國及其制度懷有好感，美國在臺官員比較容易接近他們，有些人甚至成為美國官員與臺灣黨、政高層溝通之管道。[32]

三、訪美見聞

本節主要是以曾受邀訪美者的回憶錄為素材，挑選的原則是回憶錄的主人翁曾接受美國政府邀請，或透過美援經濟、技術援助或是軍援等名目，以公開甄選、招考的方式赴美受訓。另外，他們的回憶錄或口述史對訪美見聞有所描述者。不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的回憶錄，只好割愛。[33]

31 “Educational Exchange: Semiannual Report,” Taipei Desp.167, October 18, 1956, 511.933/10-1856, Folder 25, Box 316, CU Records; “Survey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Part VII—Formosa,” December 6, 1957, ibid.

32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Taipei A-137, August 25, 1967,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Fiscal Year July 1, 1967-June 30, 1968,” Taipei A-840, August 12, 1968, ibid.;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Fiscal Year July 1, 1968-June 30, 1969,” Taipei A-371, August 1, 1969, ibid.;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Republic of China for FY-1970,” Taipei A-301, August 25, 1970, ibid.

33 本研究沒有採用以下回憶錄或口述史，因為它們沒有具體談到訪美見聞。例如王惕吾提到他在 1963 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訪問美國，見王惕吾，《我與新聞事業》（臺北：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本文以目前所蒐集到的高玉樹（臺籍非國民黨政治菁英，曾任臺北市長，1951 年赴美受訓）、楊基銓（臺籍非國民黨政治菁英、漁業專家，1951 年與高玉樹同時赴美受訓）、吳魯芹（大學教授，1952 年訪美）、曾虛白（新聞界名人，1953-1954 年訪美）、王昇（蔣經國親信、國軍政戰系統核心人物，1955 及 1968 年兩度受邀訪美）、齊邦媛（大學教授、英美文學學者，1956 年赴美受訓）、桂裕（大學教授、著名法學家，1957-1958 年赴美訪問），汪彝定（曾任國貿局長，1958 年赴美訪問）、關吉玉（財經界名人，曾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1959 年赴美訪問）、陳紀瀅（立法委員、知名作家，1961 年赴美參訪）、林海音（出生日本，成長於北平的臺籍女作家，1965 年赴美參訪）、趙聚鈺（蔣經國親信、臺灣財金與保險業界重要人物，長期擔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主任委員，1967 年赴美訪問）、侯斌彥（高雄市臺灣新生報社社長，1966 年赴美訪問）、葉昌桐（前海軍總司令、三軍大學校長，曾在 1950 年上美艦見習，1952、1955、1960、1966 年多次赴美受訓）等人的著作為主要研究資料。[34]

挑選這些人物的相關著作，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曾在 1950 年代及 1960

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頁 131。許子秋在 1951 年與高玉樹、楊基銓同時赴美受訓，見林靜靜，《壯志與堅持：許子秋與臺灣公共衛生》（臺北：董氏基金會，2002）；雷穎在 1952 年經過考試，獲選派赴美國陸軍兵工學校正規軍官高級班接受兵工作業訓練，見雷穎，《造化遊戲四十年》；張希哲以逢甲大學校長身分，在 1965 年應國務院之邀赴美考察高等教育，見張存武訪問，李郁青記錄，《張希哲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謝東閔曾在 1957 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參觀家政教育，見謝東閔，《歸返：我家和我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蔣經國（1910-1988）在 1953 年 9 月接受美國政府邀請赴美訪問五週，隨行擔任翻譯的沈錡將經過情形寫成〈隨經國先生訪美記〉，原文載於《傳記文學》第 65 卷第 6 期到第 66 卷第 4 期（1994 年 12 月-1995 年 4 月，臺北），後收入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 143-235。由於該文不是以蔣氏自己名義執筆，無法看出太多蔣氏的觀察與反應。梅可望在 1963 年應美國務院之邀，赴美考察警政、獄政及警察教育，為期四個月，見梅可望，《從憂患中走來——梅可望回憶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8）。

34 這十四人的出身背景、經歷與回憶錄資訊，請見本文附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代應美國國務院、國防部之邀請，到美國做短期訪問，或是在美援計畫下獲選赴美接受技術或軍事訓練。回國之後，他們或將在美國的見聞寫成書出版，或在回憶錄、訪談錄中記下當年他們對美國的印象。這些人大多是以「領袖」、「專家」專案，或後來的「國際訪客」身分應邀赴美。其他如王昇兩次訪問，都由美國國防部及在臺美軍軍事顧問團負責，應該是國防部及美援經費安排。葉昌桐是在美國顧問團軍援訓練計畫下，被甄選赴美國軍校受訓、進修。高玉樹與楊基銓是以美援技術協助計畫，分別以工程和水產行政赴美受訓一年。齊邦媛是本研究目前找到唯一以英語教師身分赴美受訓半年的人，她第二次赴美是以傅爾布萊特教育交換法案赴美教學兼進修。[35]本研究對每一位應邀赴美或赴美受訓者，都找到至少一本回憶錄做為研究材料。

不過，本研究並未找到可用的企業界人士回憶錄。通常美國是利用美援經費邀請工商業界人士訪美或赴美受訓。[36]例如臺籍菁英丁瑞鈇在 1960 年 6 月由美援會安排，赴史丹福大學接受企業管理人員訓練計畫半年。丁氏曾為大同公司經理與董事，以後轉任臺灣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從美國受訓回來後，轉任台塑企業副總經理，任內推動台塑向美國銀行貸款，是我國企業界第一個向美國銀行貸款成功之例子。然而，他

35 齊邦媛在其回憶錄《巨流河》中，提到她是 1956 年 9 月以 Fulbright Exchange Teachers' Program 獎助赴美進修英語教學及訪問半年。見齊邦媛，《巨流河》，頁 355。但是，根據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n Years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Taipei: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67), pp. 1, 8, 美國與國民黨政府在 1947 年進行了第一年的運作之後，就因國共內戰，大陸局勢不穩定，在 1949 年停頓。一直到 1957 年 11 月 30 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才與我國代理教育部長沈昌煥（1913-1998）重新簽訂教育交換之行政協定，成立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於臺灣「重新啟動」（"reactivate"）傅爾布萊特計畫。所以，齊氏在 1956 年應是以英語教師訓練計畫赴美半年，而她在 1968 年第二次赴美教學兼進修才是使用傅爾布萊特計畫經費。

36 "Education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Fiscal Year 1958,"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Desp.49, July 29, 1958, 511.933/7-2958,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6 年出版的回憶錄《懷恩感舊錄》中，並未敘述他在美國之見聞。[37]

以省籍來分，高玉樹、楊基銓與林海音是本研究中的兩位半本省籍人士。前兩位是當時受過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籍菁英，林海音成長在北平，戰後回臺灣，算是半個本省籍人士。美國在與臺灣的教育交換計畫進行之初，就積極培養本省人對美國的好感。[38] 1950 年代初期，當中華民國政府遴選美援技術合作計畫資助赴美受訓、進修人選的時候，美國共同安全分署官員總是要求維持外省籍與本省籍一比三之比率，以培植親美的本省籍技術官僚。不過當時臺灣政府執行這個政策並不容易，因為在日據時代受過高等教育或學過英語的本省人有限，在政府部門擔任高級主管的本省人也不多。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王蓬就曾向外交部長葉公超抱怨，由於美國官員對省籍比例的堅持，以致找不到合適人選出國受訓。一直等到王蓬承諾臺灣政府會儘量提供本省人初步訓練，讓更多本省人夠資格參加赴美受訓，美國共同安全分署的官員才放寬對省籍比例的要求。[39]高玉樹、楊基銓兩位是以美援技術援助計畫赴美進修，他們正是美國政府拉攏與培養臺籍菁英的代表人物，林海音則是以職業婦女及作家的身分，以「國際訪客」之名義受邀訪美。

除了企業界之外，這 14 人正是 1950 及 1960 年代來自國民黨、政府

37 見丁氏的回憶錄，丁瑞錁，《懷恩感舊錄》（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6），頁 51-53；司馬嘯青，《臺灣企業家的美國經驗》（臺北：玉山社，2002），頁 43-47。

38 例如 1950 年代，美國駐華官員認為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有歧視本省人之嫌，所以在臺灣推動私有企業（free enterprise），藉以提高本省人的政治籌碼，參見 Simon, “External Incorporation and Internal Reform,” pp. 146-148.

39 葉曙也提到美援會當時的政策，選派出國進修的人員中，外省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見氏著，《病理卅三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再版），頁 157。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從 1951 到 1960 年，獲得美援技術合作計畫之補助赴美國，或是其他國家受訓的本省籍人士有 788 人，外省籍 1,143 人（本省與外省之比例是 7：10）。Martin Wong to George Yeh, March 12, 1953, 473.42 經援技術出國人員（一），外交部北美司檔案（臺北：外交部北投檔案庫）；“Educational Exchange: Congressional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Grantees from Taiwan,”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Desp.184, October 6, 1960, 511.933/10-660,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單位、新聞界、文化界、教育界、軍方的菁英。他們都是當時臺灣社會家喻戶曉的人物，經由在美國美援計畫、《史墨法案》、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赴美訪問，回國之後著書、演講，成了當時臺灣社會美國文化的媒介之一。

這些人的回憶錄或口述史依照其出版時間，可分成兩類：從美國回來後不久就集結成書出版的，如吳魯芹、林海音、曾虛白、桂裕、侯斌彥、關吉玉、陳紀瀅、趙聚鈺、王昇等人的紀錄。另一類是回國後多年再回顧其訪美見聞或感想者，有高玉樹、楊基銓、齊邦媛、葉昌桐、汪彝定等人。後一類多是作者晚年回憶之作，雖然無法反映出美國參訪後的即時印象，但因能傳達出多年後對哪些事物仍然留存的深刻記憶，還是值得參考。

四、受邀者眼中的美國

從受邀訪美者筆下的訪美見聞，他們對美國的印象，可以整理、歸納為以下幾個議題：（一）美國人、美國文化與生活、（二）民主政治、（三）家庭與婦女、（四）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勞資關係與消費主義）、（五）種族關係、（六）美國反共運動。本節即以這些主題來討論他們眼中看到的美國。

（一）美國人、美國文化與生活

做為美國政府的客人，臺灣訪客多半對美國人彬彬有禮，對外人友善、開放的態度印象深刻。例如 1952 年吳魯芹聽到飯館鄰座向侍者要一樣東西，先說對不起，再連聲道謝的情景，讓他感歎：「我們東方人彬彬有禮的傳統，何以在東方反要漸漸失傳了？」吳氏在美國各大都市問路的經驗，讓他體會到「異國的人情味」。每當他佇立在大街上，「若有所失之際」，就會有人走上來問他是否迷路，需不需要幫忙，讓吳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感到身在萬里之外，毫無置身異域之感。吳氏尤其對華府友善之態度印象深刻。他說：「此城對任何人，不論其膚色、種族、身份，都視同家人。一個陌生人，不會嚐到閉門羹，不會感到不便。」他獨自參觀或訪友時，去過不少大小衙門，司閽者或值勤警員的第一句話，與百貨商店店員用語一樣，都是：「我可以幫助你嗎？」未見有打官腔者，或有先以不屑眼光，打量來訪者週身一番者。[40]王昇在 1955 年觀察：「以自由民主著稱的美國士兵對長官的尊敬如此，實非一般專講放任自由和表面民主的人士所能想像，在今天，美國是世界第一個強國，但美國青年彬彬有禮，並無一點驕氣。」[41]林海音 1965 年在華府街頭手持地圖找路，結果引來四位男女行人幫忙指點。她在美國各地參訪四個月，都是由各地志工或志工家庭接待，除了開車接送，陪伴「參觀遊玩」，甚至邀她在家小住。林氏認為他們的友善與體貼，不但替美國政府省下人力與金錢，也代美國政府為臺灣訪客做了絕佳的國民外交。[42]

臺灣訪客也感受到美國官員想要藉安排訪客自由旅行來展現美國社會開放的器度。1952 年吳魯芹訪美時：「國務院也深恐我這位客人嫌自由活動的時間不夠，誤會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因此官方的節目，大半只有半天，另有半天，悉聽尊便。」吳魯芹以「賓至如歸，怡然自得」八字形容他訪美經驗。[43]汪彝定談到 1958 年訪美之行，「美國人帶我去看非常貧困的黑人區與印第安保留區。那些人的貧窮與落後，令人吃驚。但邀請者，並未有要隱瞞之意，美國的開放性，更令我印象深刻」。[44]

吳魯芹對於美國人「毫無階級觀念作祟」印象深刻。他說美國人臉上呈現著「我和你一樣的好」，或許在財富、學問與才能上不如你，但作為一個人，卻是絕對平等的。擦皮鞋的也好，報販也好，每個人都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覺得自己的工作同樣為公共服務，與貴為卿相的

40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2、5-8、22。
41 王昇，《訪美散記》，頁 1、4、8。
42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51-52、196-197。
43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2-3。
44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頁 1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只在職責性質上有差別，並無貴賤之分，所以他們面對高官巨商時談笑風生，毫無自卑感。他還觀察到在美國人社交場合，主人從不遺忘介紹在場的僮僕、白丁、司機給客人，人與人之間毫無藩籬。吳氏用「民為貴」一詞來形容美國社會無階級觀念的情況，他認為這種人人平等的精神，有助於建立民主政治中最要緊的個人尊嚴原則。[45]葉昌桐 1950 年在澎湖馬公美國軍艦上見習時，感受到即使在階級制度嚴明的軍艦上，艦長雖是官階最高、最具權威的人，但是遇到非專業領域之事，他也不能不按規章，獨斷專行，沒有「官大學問大」的情況。葉氏認為這是值得我軍學習之處。[46]

1967 年訪美的趙聚鈺指出，在美國社會，人與人之間存有高度的自信與互信。美國公私機構對求職者的學位、經歷、年齡，全憑求職者自填，求職者怎麼寫，公私機構主管人員就相信，決無「繳驗證件」的形式和規定。比趙氏早十五年訪美的吳魯芹則認為，對陌生人信任，是美國人日常生活的習慣。在美國住旅館不用證明文件，只須填上姓名、住址，姓名真假也聽便。但是同樣的，美國社會很重視信用，一旦被人認為說謊，後果就很嚴重。[47]

另外，美國人的守法習慣與公德心，最為臺灣訪客津津樂道。1958 年汪彝定在紐約買報紙，是在轉角一處無人看守的報紙堆上自己取報，自己丟錢，沒有人會拿一份報而不給錢的。[48]林海音 1965 年在華府還是

45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22-26。葉昌桐在 1974 年赴美訪問時，遇見一位下班後扮演小丑以貼補家用的小鎮警局長。該警長絲毫不覺兩種職業有高下之差異，讓葉氏感受到美國人在職業上未區分高低尊卑，只要是正當職業，他們一律平等待之。見鄧克雄、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頁 247。

46 鄧克雄、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頁 67-69。

47 趙聚鈺，《訪美見聞》（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頁 222-224；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22-26。

48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頁 100。然而汪氏也提到，1970 年代，紐約街頭已經看不見讓人自動丟錢、取報的成堆報紙了。到了 1980 年代，美國報紙全鎖在鐵箱內，要投幣才能開箱。縱使如此，還是有人打破鐵箱偷取那些許零錢。汪氏感歎不過三十年，美國社會內部已質變並露出敗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同樣的方式買報紙。她在美國逛百貨公司，看到售貨小姐一人要管幾個攤位，堆積如山的貨物都是大堆擺在那裡，任由顧客自行挑撿，然後自己拿到付賬臺排隊付賬。她前往米蘇里州馬克吐溫之家鄉漢尼堡訪問，跑江湖的遊樂團來當地紮營表演，午夜演出完畢，連夜撤走，次日街上乾乾淨淨，昨夜繁囂已經無影無蹤，沒留下一紙一屑。林海音讚嘆美國人的公德心已經是一種生活習慣，沒人看到也照做。[49]趙聚鈺 1967年在華府一十字路口過馬路，前後左右均無來往車輛，行人路口豎有「停止」的燈號，無人搶步，靜待「進行」燈號亮了，行人才快步走過馬路；他參觀幾個規模很大的超級市場，管理人卻很少，貨物全擺在貨架上，無人看管，未見顧客偷竊之事。另外，趙氏看到美國公園到處都有鴿子，自由自在地在園內走來走去，毫不畏人的樣子，顯然未曾有為人侵害之經驗。[50]臺灣訪客從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觀察到美國人民的公德心。

臺灣訪客認為美國人勤奮苦幹，卻又很會享受生活。例如王昇就指出：「美國人的生活，是靠他們過去的奮鬥與創造，以及今天的積極與苦幹所得來的，他們頑的時候是痛快的頑，幹的時候卻拚命的幹。」[51]吳魯芹同樣形容美國男女老幼都是「工作時盡力，玩的時候盡興」。[52] 1953年訪美的曾虛白也有類似的描述，他認為美國人日常生活，「緊張得出人意外」，到周末享受生活，「也是拼命地娛樂」。[53]十四年後訪美的趙聚鈺作客美國人家庭，覺得他們生活「十分簡樸」，又「相當享受」。他觀察一般美國人日常生活在衣與食方面簡單不奢華，但在住、行、育、樂方面卻相當享受。趙氏看到美國一般中上家庭，幾乎家家戶戶有花園、車房和各種電氣設備，「既重視住，講究住，也懂得住」。行的方面有飛機與汽車，除了駕汽車兜風之外，還可以駕飛機兜風，讓他不禁慨歎：

49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110、152、185、190-192、226、227。
50 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215-226。
51 王昇，《訪美散記》，頁 1；王昇，《訪美紀行》，頁 186。
52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11。
53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165-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豈是別的國家國民所能想望？」[54]

王昇、趙聚鈺、林海音都對美國教育印象深刻。王昇認為美國無論家庭、學校、社會，都有一個有機體的、脈絡貫通的、自然而有效的教育整體。在這種教育環境裡，每個人在無形的薰陶中耳濡目染，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所以今天美國的富強決不是僅呈現於「表面的一些光怪陸離的物質現象，而是全部依附於潛在社會內層的一般無形的教育力量」。美國人從小就浸潤在優良的生活習慣和待人接物的禮節教育中。他在舊金山參觀一所小學，覺得美國學校教育的最大特點為注重「做」的教育，也就是教、學、做三者聯繫的教育。[55]趙聚鈺也極為推崇美國教育，強調其著重手腦並用，培養自己創造事業的精神。他認為美國進步派的教育思想，是要使「知識和生活不脫節，個人和社會不脫節」。趙聚鈺很欣賞美國教育重視體育與生活知識，注重養成社會中堅分子，而不是孤立的個人或新「士大夫」。他對美國教育從初級中學甚至小學就著重實驗，特別重視生活的知識，不要求學生背誦課文，而是要學生從活動中、從工作中去學習的教育方式印象深刻。趙氏認為美國教育系統造就了今日美國的富強康樂和社會進步，也造就美國人「自我造就」（self-made）的能力，以及「拓荒精神」（pioneer spirit）。[56]林海音參觀華府附近一家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私立中小學校之後，她報導：「美國學生不讀死書，才小學三、四年級，已經要寫 report 了，這是訓練他們的創造性，因此孩子們得像大學生一樣的要找寫報告的資料，到校內外的圖書館借書看。」[57]

臺灣訪客注意到美國雖然立國不久，但甚為重視保存歷史文物，也很積極蒐集世界文物珍品，提倡藝文表演活動。美方為這些臺灣訪客安排不少參觀博物館、美術館、動物園與歷史古蹟等觀光勝地，以及大型

54 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226-238。
55 王昇，《訪美散記》，頁 7-8。
56 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182-183、271。
57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187-1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音樂、舞臺表演場所的行程。王昇在 1955 年遍遊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觀光勝地之後，他感覺美國人：

> 似乎非常注意去製造光榮的史蹟和發揚自己的文化，整個城市，就籠罩在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傑弗遜紀念堂，無名英雄墓等所發出的光輝下，那種光輝，一面在尊崇先哲，一面在啟迪後人，此外加上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等等，使華盛頓十足代表美國的文化。每年每月，成千成萬的人群，在那裡遊覽、觀光、瞻仰、膜拜，使得一個物質最發達的美國首都，並不以物質〔取〕勝，卻整個為文化精神所佔領，全美的社會風氣，也都在這種精神的領導鼓舞下，蒸蒸日上，振作有為，世人以為美國僅有大腿文化，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58]

其他人對美國人重視博物館、藝文表演也是印象深刻。例如汪彝定 1958 年在華府參觀國家藝術博物館，那原是一位富豪的宅邸捐作博物館。館內豐富的收藏、精心的照顧，與參觀者之井然有序相得益彰，沒有囂鬧、吃零食、丟果皮者，每一人都安靜地在名家作品前欣賞。回到旅舍，汪氏寫信給妻子談到他的感覺：「相信若有天上瑤池，當也不過如此。」[59]林海音 1965 年造訪洛杉磯狄斯耐樂園、紐約世界博覽會、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洛杉磯的音樂中心之後的感覺，「就是一個字『闊』！是錢和智慧的結合」。林氏對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有一專章介紹。她特別指出林肯中心不同於百老匯歌劇院、電影和音樂演奏處所，乃在於它不是商業性的娛樂演出場所，而是由民間基金會支持的教育性藝術表演中心。林肯中心的存在，「是美國人深信藝術的重要性，而慷慨的付出時間與力量來創造它」。[60]由洛克菲勒耗費鉅資，前後費時三十多年修復、重建的十八世紀維吉尼亞州首府威廉斯堡（Williamsburg），也讓

58 王昇，《訪美散記》，頁 17-18。

59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頁 100-101。

60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21-25、243-2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趙聚鈺印象深刻。[61]在他們的描述中，美國是個富而好禮，尊重歷史、文化、藝術的國家。

（二）民主政治

高玉樹認為言論自由與公平選舉是美國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兩大基石，缺一不可。他在 1951-1952 年在美受訓期間，正逢美國兩大黨準備總統大選。他特別留心觀察美國的民主政治，每天都花不少的時間比較研究各黨各派的報章、雜誌，收聽電臺廣播。[62]另外，美國政府為高玉樹等人安排的美國國情講習課上，講師告訴他們在美國沒有言論限制，也沒有出版法，任何人的任何意見都可以發表，甚至宣傳共產主義，只要沒有違法行動，在觀念、思想或是講學都不算犯法。高氏曾詢問該講師，如有破壞分子集團乘機利用、濫用自由，來煽動一般群眾，造成社會不安，該如何是好？美國講師回答：

> 言論自由的國家，左右中間，都有各色各種的意見，但人類社會，尤其民主政治開放的社會，代表極端左右翼的，從歷史上統計，畢竟是極少數，站在中間而略偏左右的，一定是絕大多數，其曲線一定慢慢向兩邊下降，最後到達左右派最極端的零點。所以言論完全自由，其思想的平均，一定是中間稍偏左右的範圍，對國家對社會絕對無可憂的地方。反之以人為的限制言論自由，很多的主觀思想在滲進政治權力的結果，往往會偏左偏右而離開大多數民意，而必須使用更多的政治權力來彌補壓制。所以，美國的開明社會，在民意思想體系上不需要政治權力來倡議或干涉，其原因在此。[63]

美國講師還告訴高玉樹說：「美國沒有革命思想，也沒有革命意圖之不逞份子，因為言論沒有限制，對政治不滿，不管中央或地方，幾年一次

61 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253-259。

62 高玉樹口述，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頁 58-59；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320。

63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8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選舉投票，就可有選擇，更換政權，不必使用暴力。」不過，該講師指出美國雖然有言論自由，但美國法律體系對名譽毀損、人身攻擊的誹謗有嚴格的規定，犯者將受嚴格法律制裁。美國連總統都可以自由批評，人民也可以自由提出相反意見，但不能捏造事實來公開誹謗任何人。高玉樹認為就這一點而言，「民主開放社會政治，比其他體制政治乾淨而正直的理由在此」。多年後，高氏回憶這次講習會是「我們了解民主開明政治的初次機會，印象深刻，記憶歷歷如新」。[64]

高玉樹還觀察到美國人非常重視公平的道德規範。他指出因為美國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組成，如果要團結這人種複雜的移民社會，首重公平公正，否則無法使大家共享共存，建設一個龐大國家力量。因此美國政治制度之基本選舉，絕對堅持公平競爭，如有作弊行為，一定大肆抨擊並追究到底。[65]

美國講師特別強調民主修養是「少數服從多數」和「互相尊重」。高玉樹認為「少數服從多數」容易了解，但是為什麼「互相尊重」要作為第二要件不可？高氏認為美國人雖然平素各說各話、吵吵鬧鬧，表面上看起來很不團結，但兩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軍隊在戰場上的效命盡忠與袍澤之間的相互支援，使世界刮目相看，不敢輕侮。[66]

至於美國的司法制度，美國講師告訴高玉樹，美國憲法是三權分立，司法權完全獨立。從地方法院開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案件之審判。憲法條文解釋等司法相關問題由大法官會議裁決，採多數決終極定論。從地方法院開始，陪審制度非常普遍，都是聘自士農工商領袖階層的社會賢達。[67]講師說任何司法案件要百分之百正確公正判決，是不可能的，

64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90-91。

65 高玉樹口述，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頁 58-59。

66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84-85、91。

67 此處高氏敘述美國陪審團成員產生有誤。美國陪審團的成員不一定來自「社會賢達」或「領袖階層」。他們通常是由隨機抽選自無犯罪紀錄、具備合理智力的當地成年公民組成。參考 John W. Reed, “Jury,” *Encyclopedia Americana. Grolier Online*, http://ea.grolier.com/article?id=0226500-00 (accessed June 18, 2010); Harry Kalven Jr. and Hans Zeise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是多數人之判斷絕對比一個人的判斷正確性高。雖然陪審員不一定有法律的專門知識，不過憑其豐富的生活經驗、社會閱歷，對被告的申訴、證人的證言，態度、表情與陳述內容，總有較深的觀察。他們所做的複雜的綜合判斷，往往比一個法律專家的主觀要正確得多。這種陪審制度使司法黃牛無從施技，陪審人員普通十一至十五人，打通全部管道根本沒有可能，因此司法汙染的機會很少。高玉樹讚嘆：「有如此乾淨獨立的司法制度，美國社會才能公平公正，民無冤情，結仇不深，才能促進大同團結，國家存亡關頭，自不惜為國犧牲，保衛熱愛國家。」[68]

與高玉樹、楊基銓同時見證了 1952 年美國兩黨黨內初選總統候選人過程的吳魯芹，則從選民與政治人物的角度，觀察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平等、自由與個人尊嚴的原則。他認為一般美國人對政治的興趣比臺灣濃厚，也喜歡在陌生人面前表達。每一個可以投票的美國人，對他那張選票看得珍貴之至，一副有了它就大權在握的神情。吳魯芹認為民主政治在美國，得力於每一公民之「忠於自己，尊重別人」習慣；到必須有所取捨時，他的指導原則是「吾從眾」。至於「玩政治者」，吳魯芹指出，不論在朝在野，都不敢得罪人民。「民為貴」之說，在美國顯得特別有分量，特別能夠發揚光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還不夠，必得博得人民的歡心與信任，否則四年一滿，休想戀棧。「在美國凡執政者，沒有不挨罵的道理」，民主第一要能容，要有胸襟。而「民為貴」的精神，吳氏認為直接幫助了建立民主政治中最要緊的個人尊嚴原則。[69]

王昇在 1955 年第一次訪美時，也感受到美國領導者與人民之間沒有什麼隔閡、距離。他注意到白宮「出人意料之外」的普通，完全不是他想像中的「偉大而富麗堂皇的建築物」。白宮每週至少有兩天開放，供

"Jury,"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 Academic Edition,* http://www. 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308620/jury (accessed June 19, 2010).

68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92-93。

69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14-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參觀，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這座領導民主國家的美國總統的住所。白宮內部陳設並沒有什麼特殊。此外，國會也可任由人民自由進出參觀，在布置陳設上，特別強調各州的意義與特點，使得每一州來參觀的人都有親切感，感覺這是他們自己的議會。這些地方使得王昇不得不佩服美國領導者「深刻高明的手法」。[70]

（三）家庭與婦女

臺灣訪客發現一般美國家庭，與他們在好萊塢電影或文學上所呈現的動輒離婚不一樣。他們來到美國之後，大都有被安排住在志願接待家庭中的經驗。依照他們近距離觀察，美國婚姻比較自由，離婚的案子很多，但一般人都非常重視他們的家庭與婚姻。雖然不少婦女婚後仍有就業，但都將管理家務與養育孩子視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環。已婚的人多數主張愛情專一，重視夫婦間感情。惟美國大多數夫妻只有一、兩個孩子，四個以上即屬罕見。吳魯芹訪問的美國人家似乎比較好客，喜歡約朋友在家裡小聚。趙聚鈺觀察的美國人則視家庭為「堡壘」，不喜歡鄰居、朋友隨便闖入，下班或工作之餘，只顧關起門，一家老幼靜靜享受家庭溫馨，不去打擾朋友、鄰居。[71]

幾位臺灣訪客都注意到美國一般是兩代的家庭，只有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同住，並未包括老一代的祖父母。美國人極其注重培育第二代小國民。從母親懷孕到嬰幼兒出生，各式各樣的食品、用品、衣服都可以在市場購買。家庭與政府對兒童衛生、教養都很重視。1959 年訪美的關吉玉稱美國可謂「兒童天堂」。[72]然而兒女長大以後，便自立門戶，另創家庭，各奔前程。美國父母不靠子女養老送終，他們大多數依靠自己

70 王昇，《訪美散記》，頁 18-19。蔣經國訪問胡佛水壩時，沒見到衛兵站崗，他告訴沈錡，美國社會的開放不是臺灣所能比得上，見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 238-239。

71 王昇，《訪美散記》，頁 12-13；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9-12、29；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48-52；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231。

72 關吉玉，《訪美見聞》，頁 91-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保險金和積蓄來維持晚年生活，父母子女之間，有如對待親戚朋友，偶爾探親，相敬如賓。美國社會雖然有養老制度、退休制度、社會福利與醫藥健康保險，王昇、林海音、關吉玉卻一致表示，他們並不羨慕美國老人生活，因為美國老人享受不到中國社會那樣兒孫繞膝、含飴弄孫的天倫樂趣。關吉玉認為：「老年父母獨守家宅，渡其孤寂生活，此實為美國生活方式之一缺憾。……就我東方人眼光觀之，殊感子女孝道有虧，人生意義不夠美滿。」[73]

吳魯芹與王昇都很欣賞及佩服美國家庭婦女吃苦耐勞。在他們筆下，美國婦女日常生活非常繁忙，極大多數人家沒有雇人幫忙，一切家務都由主婦親自操持。她們除了要管理家務、燒飯洗衣、養育兒女，而且有人還要出去工作，或每星期抽出時間在慈善機構擔任義工。家務雖有機器幫助，但機器也要人去開動，而且機器也只能處理一部分的工作。一般美國家庭，無論這位主婦是碩士或博士，是醫生或教師，只要有家庭就得操持家務。[74]顯然兩位臺灣男性訪客觀察美國婦女生活，強調的是美國婦女以家為重，和他們的持家者（homemaker）角色。

然而，曾虛白在 1953 年就觀察到美國女人已經有了改變。曾氏在《東遊散記》中寫道：「家庭不再是女人的安樂窩，只像她的一個臨時宿舍。變成她從辦公室到菜館、戲院、跳舞場、俱樂部中間的過夜的歇腳處所。」二次大戰以後，婦女就業人數比過去大大增加了，可是居高位、拿高薪的人數卻少得可憐，他們大半都只擔任書記、招待員、店員、打字員等工作。現在婦女不再像過去找到丈夫，就鑽進廚房不再出來，他們就業是為了分擔家庭經濟。然而，美國社會上男女就業不平等仍有待改善。家庭經濟轉由男女分擔後，家事也變成兩人平均分攤。曾虛白到美國友人家裡做客，看到男主人下廚房做菜、洗碗是常事。[75]

---

73 關吉玉，《訪美見聞》，頁 95、118；王昇，《訪美散記》，12-13；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32-35。

74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10-12；王昇，《訪美散記》，頁 33。

75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35-38、42-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氏還觀察到美國婦女的解放，不再限於工作範圍以內。他指出美國青年女子受到心理學家佛洛依特理論影響，相信無拘無束的性關係是健全精神的主要因素，因此她們解脫過去畏縮被動的姿態，主動與男子平分秋色。曾虛白認為美國女子對「性關係澈底解放」之態度，對婚姻產生嚴重後果。男女雜交變成普遍現象，沖淡結婚的神聖意義，毀滅了夫妻結合最重要的真情真愛因素。[76]曾氏觀察婦女解放一事，可以印證近年歷史學家認為 1960 年代發生的各種社會運動，早在 1950 年代就已經埋下種子。過去的研究認為，1950 年代的美國婦女皆被困在家庭中，待 Betty Friedan 的 *Feminine Mystique*（1963）一書問世之後，才觸發了美國史上的第二波婦女運動；事實上並非全然如此，婦女在 1950 年代就已經開始有掙脫社會對她們束縛的跡象了。[77]

不過曾氏顯然對於美國已婚婦女普遍就業之事不以為然。他認為在和平時期，美國婦女搶著就業的原因是「錢不夠用」。他指出「在美國這樣一個社會中，家庭享受是沒有止境的。太太小姐們好勝心特別強，親戚朋友一比較，總覺得自己的生活水準比別人低，因此，朝朝暮暮的刺激，逼著她們非自己出去找錢不可了」。他看到美國村鎮的住宅區內，「孩子滿街跑，沒有人照管是經常看得到的現象」，因此曾氏認為美國當時的青少年問題（他稱之為「美國十三太保問題」）與夫妻關係的疏離，忙於自己事業的已婚婦女應負「大部份的責任」。[78]

林海音在 1965 年訪美考察的重點之一，就是美國婦女與家庭。依照美國勞工部婦女局國際組主任告訴林海音的數據，1960 年代中葉美國婦女生活已經發生了一些「革命性」的現象。當時的美國婦女有一半在 20 歲以上結婚，平均在 26 歲生下最後一個孩子。當年的美國女性十之八九都服務過社會，1965 年左右就有 2600 萬名女性在職，估計到 1970 年可

76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44-46。

77 Richard M. Fried, “1950-1960,” in *A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America*, ed. Stephen J. Whitfield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pp. 80-81.

78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44-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達 3000 萬人。1960 年代，美國工作者每 3 人中有 1 位女性。每 5 個職業婦女中，有 3 個結過婚。1963 年，多數女性工作者已婚，平均年齡為 41 歲。美國家庭一方面因為家務設備和烹飪器材進步，減少了婦女操持家務所需時間，另一方面由於孩子教育費、家人健康保持費，以及各種物價升高所增加的費用（提高生活水準所必需），夫婦得雙雙外出工作賺錢。所以 1960 年代的美國婦女除了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還得學習一樣本事，以備未來服務社會。美國婦女在婚後生育期內，多在家中育兒（因家中沒有傭人，或老一輩代為照顧），出外工作者多是未婚或未生育的已婚婦女，以及生育、教養壓力減輕的中年婦女，年輕已婚婦女多在家中生兒育女。[79]

身為女性，林海音特別注意到美國家庭的漂亮廚房。她寫道：「美國家庭都有一間乾淨、漂亮、方便又完備的廚房，它在整棟房子的經濟價值分配上，是與其他房間一樣，甚至還更超過。通常廚房設備是一座瓦斯爐臺，一共有四個灶口，另外連帶烤箱一個。至於洗碗槽、處理臺、壁櫥，都是隨著房屋的建築已設計好成套的。租賃或購房子的時候，別的家具也許有的要房客自己準備，但是廚房的一套，連冰箱甚至炊具，卻常是現成的。」美國人要他們的主婦在廚房裡儘量縮短工作時間，所以為廚房的設施和工具花樣甚多。他們對廚房的重視，不是「味覺」，而是「視覺」的。林氏認為美國乾淨美麗的廚房是主婦的夢想，但他們的餐食卻簡單得不能匹配。她說美國人「有一間複雜的廚房，但做的是簡單的菜」。林海音的廚房論，令人想起 1959 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13-1994）與蘇俄共黨總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urshchev, 1894-1971）在莫斯科進行的「廚房辯論」（kitchen debate）。當時尼克森向赫魯雪夫誇耀資本主義優於共產主義，美國婦女不需要辛苦從事男人的工作，美國設備新穎的廚房和各式各樣的消費貨品可以讓婦女在家輕鬆操持家務。林氏不一定還記得數年前美蘇兩國領袖的「廚房辯論」，不過她顯然嚮往做一個擁有美國式廚房的職業婦女，而不是

79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26-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個擁有漂亮廚房的家庭主婦。[80]

（四）資本主義社會

臺灣訪客都對 1950、60 年代美國的富庶印象深刻。1955 年訪美的王昇認為有些工商業進步的國家，會因為沒有廣大的農業而擔心原料與食物缺乏，故以法令來限制人民消費或統制某種物資；但在美國剛好相反，美國有深厚的農業基礎，工商業又發達，美國人所擔心的反而是怕吃太多、發胖、沒地方停車。曾虛白指出，美國因為資源豐富，在生產不停擴張的情況之下，幾乎不必憂慮原料難以為繼的問題，實在是美國得天獨厚的地方。汪彝定回憶 1958 年時，「美國的富庶，令來自貧窮國度的人感嘆不止。我那時年紀已近四十，在社會上服務逾十年，可以說是具有相當觀察力。我感覺美國就像古羅馬帝國一樣，是一個真正超級強國，世界絕無任何國家、任何力量可與它匹敵」。1959 年關吉玉也慨嘆在美國從來不必擔心生產不足導致經濟恐慌，反而曾因生產過多而發生經濟恐慌，這與經濟不發達國家之情況根本不同。[81]

臺灣訪客極為推崇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曾虛白指出，自由企業是美國立國政策的主要原則，自由企業可以鼓勵個人創新的精神，提高生產效率，是激發每一個人潛在能力最適當的方法。自由、平等的環境在美國社會中造成了一種巨大的推動力，使人不由自主激發所有力量來促進社會進步與繁榮。效率的基礎奠定在確定個人人格的原則上，使每一個參加競賽的人都得到平等的地位。任何人在美國只要有一可糊口之職業，就可以享受到與有錢人相差無幾的生活。企業機構的上層者受到工會監督，惟恐工人不信任他。在自由競賽的制度中，每一個人得到獨立

80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139-142；Emily S. Rosenberg, “Consuming Women: Images of Americanizatio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23:3 (Summer 1999, Malden), pp. 488-489.

81 王昇，《訪美散記》，頁 38-37；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172；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頁 100-101；關吉玉，《訪美見聞》，頁 57-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主的人格，這人格受到法律的保障與伙伴的重視。曾氏指出美國今日社會是一個智愚不肖站在同一場地上、同一起步線上，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競賽場了。美國社會雖然還有上層、下層之界限，可是這分界線不是固定的，構成上下階層的分子更是流動的，上下昇沉全仗每一個人自己的努力。而美國社會財富由集中而日趨分散，生產工具從獨占的資本家手裡轉入管理專家的掌握，貧富界線漸漸消失，而大眾生活的水準還不斷提昇。[82]

王昇 1955 及 1968 年兩次參訪美國之後，認為美國社會已是邁向大同社會的初步階段。他認為美國國力不是操之於政府，而是潛藏於廣大的社會。由於私人企業的發展，個人財富的普遍增加，社會力量逐漸臻於雄厚，任何人在這個機會均等的社會裡，只要腳踏實地苦幹，不愁沒有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一般富人熱心社會公益事業。他認為最值得稱道的是「美國的社會安全制度，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用，疾病有所治療，失業有所救濟，實在是走向大同社會的初步」。[83]而王昇在 1968 年再度訪美後，認為共產黨在美國搞不起「社會革命」，原因在於政府不但禁止私有經濟壟斷，積極管制私有企業的生產政策，再加上公司股票分散於社會大眾，高額累進的所得稅平均了社會財富。美國的資本主義透過民主政治的和平改革，成為「人民資本主義」或「民主資本主義」。[84]

在 1959 年專門赴美考察財經制度的關吉玉，也認為美國工商業首重自由競爭，任憑優勝劣敗與自然淘汰。美國工業雖資本集中，但並不壟斷，自由競爭，不能獨佔。經濟自由在政府監督與法律規範下進行，私人企業不能傷害公眾利益。關氏還特別推崇美國稅制，因為聯邦政府收入約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租稅，而各州各市除補助款外，所有歲入亦幾

82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161-165、167。

83 王昇，《訪美散記》，頁 15、22-23、30-31。

84 王昇，《訪美紀行》，頁 168-176。「人民資本主義」（People's Capitalism）其實是美國新聞總署從 1955 年起，在美國國內外推動的一系列宣揚美國資本主義優於共產主義的宣傳活動，它強調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是使每一個人民都成為資本家。見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pp. 270-274;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pp. 131-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乎全部來自租稅。聯邦政府租稅收入中約 80%以上係出自所得稅，關吉玉認為這是「最理想的租稅結構」。美國所以能有此租稅結構，是因國民富庶，故租稅負擔能力強大，工商業發達，會計制度健全，加上國民「守法愛國」，自動繳稅，政府有決心推行各種政令，才能達到如此成果。[85]

臺灣訪客多半對美國人當時的強大消費能力感到驚訝。王昇就提到在美國購買衣著並不便宜，但是美國人的購買力卻非常強，許多上百貨公司的人，「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挾著出來，好像不要錢似的」。[86]不過當年更令他們驚奇而不解的，應該是美國以刺激消費來繁榮經濟的觀念。高玉樹回憶，1951 年在美國國情講習班上，他們「感到稀奇驚異的，是美國人的經濟原則，是人人享受高度物質消費，愈多愈好，愈豪華奢侈愈好，這種無限度的慾望與需求，才是美國高度經濟繁榮的原動力」。美國講師告訴他們，在工業社會，有消費才能刺激更多的生產。為了刺激消費，商業廣告五花八門；為滿足美國人的購買慾，於是設計出分期付款制度，讓人先享受，再慢慢付款。這個辦法不但使信用擴張，工業生產也因之膨脹，造成國家經濟力量膨脹，同時也增加國力。美國講師還說，在高度資本主義自由企業之經濟結構中，如果有一天美國商業廣告全被銷毀禁止，則美國的經濟結構將立刻萎縮，國力也隨之急劇下降。對於美國講師從消費主義的邏輯來分析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讓出身農業經濟社會、以節儉為美德的高玉樹大嘆：「有時必須從觀念到實務作適度的調整，對國家經濟發展才有幫助。」[87]林海音在 1965 年也發現在美國「購買」的觀念與在臺灣不一樣，它不止是因需要而購買，也為享受而購買。她也覺得「工業社會的許多新觀念，是要我們農業社會的舊觀念重新調整的」。[88]

85 關吉玉，《訪美見聞》，頁 61-62。

86 王昇，《訪美散記》，頁 9、18；另見關吉玉，《訪美見聞》，頁 3-5，討論美國經濟思想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87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85-87。

88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151-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高玉樹與王昇顯然並不完全同意美國社會為刺激生產而鼓勵過度消費。高玉樹認為這位美國講師忘了如此鼓勵超額消費，使絕大多數美國公民一生陷溺在分期付款償債的壓力中，結果美國人在豐富的物質消費洪流中難逃債務纏身。王昇也認為在美國社會有一股碩大無比的商業勢力在背後導演操縱，商人為了賺錢牟利而刺激消費。美國人有現款的可以享受，沒有現款的人也在鼓勵消費的政策與高度商業的引誘下，無法不「打腫臉充胖子」，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享受，這樣寅吃卯糧，一生都有還不清的債。[89]

勞資關係是資本主義重要的一環。1951 年，高玉樹的美國講師告訴他：美國勞工罷工是例行常事，常有戲劇性行動。因美國事事以「公平」為國家基本原則，「勞工要分享企業的部分利潤，是毫不足怪，也不會視為圖謀不軌」。尤其在美國的「進步資本主義」之下，股東關心投資報酬，經營幹部關心公司業績，勞工所關心的則是工資、福利及分享利潤，三者利害關係常有衝突，罷工行為時有發生。但美國一切以法律為依據，在公平相處原則之下，勞方並不是隨時都能罷工，因勞資的契約有期效，如果沒有違約事項，公司不能解雇勞工，勞工也不能以罷工來對付公司。高玉樹旅美受訓的一年中，適逢美國鋼鐵工業進行五十五天的大罷工。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命令將鋼鐵業收歸國營，鋼鐵業於是向最高法院提訴，控告杜魯門總統違法濫權，結果最高法院裁決鋼鐵業勝訴。高玉樹當時每日看報紙討論，對於美國「輿論絲毫沒有譴責勞資雙方的現象，也不像我們東方人視罷工為擾亂社會秩序暴徒的行為」，頗感奇異。[90]顯然高氏親眼看著勞工可以依法罷工抗爭，而美國政府中司法權獨立，不一定就支持行政部門的決策，都讓他印象深刻。

王昇也對美國勞資關係有所觀察。1955 年他「經過很大的交涉」，

89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86-87；王昇，《訪美散記》，頁 18；王昇，《訪美紀行》，頁 186。

90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94-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才得以訪問到一個在通用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GM）工作了近二十年的義大利裔美國工人家庭。王昇認為如果馬克斯還活著的話，看到這種工人之家，一定會奇怪得跳起來──為什麼享受「剩餘價值」的竟然是工人階級？馬克斯的資本論在這工人面前被連根推翻了，美國工人並沒有如馬克斯所想像的那樣，與資本家利益相衝突。雖然有許多地方常發生罷工罷業，但工人受到工會的保護，不致於遭到資本家過分剝削，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享受到努力工作的成果。[91]王昇注意到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工人生活富足，不致於被共產主義所吸引。

曾虛白在他的《東遊散記》一書中，有六章介紹當時美國的勞資關係和工會運動。他親自到波士頓、匹茲堡、舊金山訪問資本家、工會與工人，還到費城去訪問賓州大學工業關係教授 Dr. John Abersold。曾氏認為，美國工會保護工人的利益無微不至。工資提高、工時減少、工作環境改善與工作安全之保障，勞工保險、養老、育嬰等福利增進，都是工會近幾十年來奮鬥之成效。工會不但對工人貢獻良多，也影響工業生產，而社會繁榮是推動美國富強的主要力量，工人實為美國繁榮的奠基石。工人（5000 萬人）只占總人口三分之一，參加工會者只有 1600 萬，占工人總數三分之一，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是他們有組織，少數人行動可以影響社會，發動改革美國社會型態的力量。然而許多工會領袖沉醉在他們所擁有的權威中，反壟斷的鬥爭反而使自己變成追求壟斷的人。[92]

曾虛白很關心美國勞工是否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他認為共黨最主要的號召是為工人利益而奮鬥，他們在任何一個國家裡要滲透社會、奪取政權，總以爭取工會為主要任務。曾虛白聽說舊金山碼頭工會有不少共黨潛伏分子，遂親自到舊金山的美國勞工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訪問。讓他放心的是，AFL 的總幹事海寧（John Hening）告訴他，該碼頭工會過去曾經是 AFL 與工業組織總會（Congress Industrial

91 王昇，《訪美散記》，頁 31-34。

92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74-76、78-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rganization, CIO）成員，可是因為組織中有共黨分子，被這兩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除名了。海寧還說，事實上這個碼頭工會的領袖並不是共黨，而其大部分會員也不願被染上紅色嫌疑，一旦發現一個共產黨徒，就會群起圍攻，決不讓他有發展的機會。[93]

（五）種族關係

1950 年代的臺灣訪客曾親眼目睹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待遇。例如楊基銓 1951 年在華府就親身經歷過美國的黑白差別待遇，幸運的是，當時在華府，臺灣人並不屬於「有色人種」。楊基銓搭公車，坐在公車最後面的座位，剛好有一位黑人上來，他不敢坐在楊氏前面的座位，不得不站著。結果公車司機要求楊氏移到車廂前面的坐位，好讓黑人有位子可坐。1952 年吳魯芹在南方看到種族隔離的情形，他在車站的候車室注意到，「黑白分明，大家井井有條，井水不犯河水」。[94]

吳魯芹雖然對黑人遭受不平等待遇感到遺憾，但對於美國黑白關係的改進抱以樂觀的態度，並期待美國社會能有更快速的進步。吳氏曾詢問十個以上的鐵路臥車侍者，他們都同意美國這一、二十年的種族關係已有改進。吳氏認為至少令人安慰的是，黑人本身體悟到種族關係的改進，要靠黑、白雙方面的努力。如果黑人永遠覺得自己是被壓迫的、被欺凌的二等公民，聽天由命，把憎恨委屈全歸咎於皮膚的顏色，那美國種族關係也就不易進步了。吳魯芹曾擔心共產黨會利用美國的種族歧視來分化美國。不過當他得知美國重要工會 AFL 和 CIO 中負責領導責任的黑人，都是知名的反共人士，就很「放心」了。吳魯芹很樂觀地認為在美國「衣食足是避免共產黨滲透的萬靈藥」，雖然達到種族平等還有待時日，但美國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給予人們改善的希望與機會。

---

93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92-97。

94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頁 233；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36。事實上，根據美國國務院統計，從 1957 年到 1961 年，有 14 件來自亞、非、拉丁美洲的外國客人、外交官在美國受到歧視待遇的案例，見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pp. 276-2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外他也看到白人在良心和觀念上的覺醒，使他對美國未來改進種族關係一事樂觀以待。[95]

在 1965 年訪美的侯斌彥，就他當時的觀察，也認為美國黑人運動應該很快可以達到目的。但是他認為種族糾紛不只是政治或法律問題，還牽涉到社會與教育問題，這有待黑人自身的長期努力。美國是一個人人平等、競爭卻非常激烈的社會。一個努力的黑人，如宴請侯氏等人吃飯的黑人法官，也同樣獲得人們的尊重。所以黑人要求得社會上平等的地位，必須自身在教育方面下功夫。雖然侯氏自稱對黑人爭取民權運動寄予同情，但顯然他認為黑人要付出較大的努力，以獲得美國社會的平等待遇。[96]

林海音對美國黑人的處境似乎並不同情。1965 年初到美國，她在 CLS 的國際中心聽講有關美國文化歷史等課程時，有一位青年黑人教授現身說法，講述美國黑人的遭遇。他認為皮膚的顏色在美國社會是造成種族歧視的原因之一，因為常有黑人以電話或信件應徵工作，但等到約期見面，對方看見來的是黑人，立刻改換口氣說抱歉已找到人了。林海音對此說法的反應是自問：「如果黑人的顏色變成白色，豈不可使黑人感覺自己一樣是『高等黑人』，也就提高了他的氣質，減少許多因自暴自棄而為非作歹的事情？還是黑人真像人們所認為的是不可救藥呢？」雖然是問句，卻反映出林氏並不完全認同這位黑人教授的看法。她顯然認為黑人自暴自棄，無可救藥，黑人迅速的「繁殖」和拼命湧向都市，才為美國製造了最大問題。她描述在紐約地下鐵的乘客有一半是黑人，很多是衣冠不整、神情不正的人，還曾聽說紐約地下鐵曾有夜歸婦女被黑人蹂躪的事。她承認美國黑人有時使人產生「可怕」的感覺。[97]

王昇也不同情美國黑人的處境。在 1955 年第一次訪美時，他完全沒有提到美國的種族問題，十三年後第二次訪美時才注意到黑人的問題。

---

95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35-40。

96 侯斌彥，《美國行》，頁 107-108。

97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101-102、186-187、2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在《訪美紀行》一書中寫道：「美國社會對黑人有種族區別，這當然是事實，要說美國政治、法律上對黑人有歧視，那是冤枉美國。」王昇認為 1964 年《民權法案》與 1965 年美國的《投票權法》，禁止舉行「資格測驗」等措施，都已保障了黑人民權。黑人在美國之所以發生問題，據王昇的觀察與分析，主要有下列五個原因：第一是歷史的宿怨。有許多南方佬記著過去的宿怨，拚命慫恿黑人北上謀生，送他們北上單程車票，一到北方城市就申請失業救濟和福利，所以大批黑人湧向城市，製造都市問題。第二是文化程度。他認為「黑人是比較缺乏適當文化背景的族眾」。黑人區的一般現象是貧、愚、髒。貧的問題與文化程度有密切關係；黑人不講究生活水準，因此也就絕不考慮節育；黑人文化程度既低，而體魄強健、生機旺盛，那裡還能「克己」而「復禮」？從性的放縱到搶掠為非的事情，無數越軌蕩紀的行為自然會發生。第三是教育。美國政府只會把部分資源分給窮人，卻沒有把錢投資到黑人教育事業，「雖然一部分的黑人懶散也是事實」。第四為政客的推波助瀾。王昇認為黑人因為文化程度不高，容易被政客利用。第五是共產黨的滲透分化。王昇認為黑人在文化程度上比較「無知」，在經濟生活上的「貧困」，形成與白人在社會地位上的「不平」，造成共產黨滲透分化的好機會。他認為在當時美國社會條件之下，美國政府應該投資黑人教育事業，使黑人年輕一代完成義務教育，學會就業技能，並另給優待，培植黑人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他們的文化水準，改善他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才是根本解決黑人問題的辦法。[98]簡言之，王昇認為黑人的處境是黑人先天的文化落後與經濟貧困所造成的。王昇討論黑人問題時，所使用的言詞與邏輯，已經可以說是種族偏見者（racist）。

曾虛白是這十四位訪美人員中，唯一從黑人角度來討論黑人問題者。1953 年，曾氏到紐奧爾良的黑人活動中心「都市同盟」，訪問其黑人領袖麥丕森（J. Westbrook MacPerson）。麥丕森告訴他：黑白隔離不只是在車上，還在教育方面；居住、餐廳、戲院及其他的遊藝場所，在

98 王昇，《訪美紀行》，頁 187、190-1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展現黑白之間的鴻溝及白人的優越感。這是白人一種心理病態，影響到全體黑人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基礎。由於種族歧視，美國黑人雖身處如此繁榮的時代，經濟狀況仍然十分困苦。黑人目前不會失業，卻有大才小用，或用非其長之憤慨。黑人問題其實是白人問題，是白人心理問題。黑人的智識技能以及一切言行，的確都比不上白人水準，但不能讓黑人負擔這個責任。白人壟斷了社會向上發展的機會，不讓黑人平等享受機會，從就學到就業，每一階段黑人都受到歧視與限制。[99]從曾虛白的描述中，美國黑白問題，其實白人要負較大的責任。

（六）美國反共運動

雖然美國是領導世界反共集團的國家，臺灣訪客卻很擔心美國會被共產黨顛覆。例如曾虛白與吳魯芹都曾相當憂慮共產黨會利用美國種族關係和勞工運動分化美國。[100] 1958 年訪美的桂裕也認為，共產黨欲滲透的對象原是這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現在他們侵略工業落後的國家，不過是利用這些國家作為橋樑而已，最後的目標實不在此。所以桂裕認為：「資本主義面臨存亡關頭，稍一退卻，便全盤解體，不可收拾。」[101]言下之意，美國才是共產黨的最後目標。

王昇在 1955 年聲稱他在美國看到了「美國反共運動的新形態」。他原來擔心美國一般人對共產黨認識不夠。當他參加美國聯邦民防參謀大學（Civil Defense Staff College）舉辦的一週民防訓練後，讓他「出乎意外的高興」，因為他發現美國領導者不僅對共產黨有「正確的認識，而且他們在反共運動的某些技術和方法上，比較自命有三十多年反共經驗的中國，並無遜色」。他參加的民防訓練是「美國領導階層精心而藝術地設計所展開的一個全面反共運動的新形態。他〔它〕的目的是希望從思想和組織上將美國建立成一個堅強的反共抗俄的戰鬥體。……他們所

99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133。

100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92-97；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35、37-39。

101 桂裕，《訪美雜記》（臺北：桂裕，1959 改訂版），頁 30-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講的民防戰略，主要是從積極方面認清敵我基本理論的異同，從而建立全面的反共思想體系，……而更主要的是在研究羣眾的運動和有效的組織，……他們希望因此使全美人民都能自覺的建立反共思想，自動參加民防組織」。凡是願意接受民防組織的州，都採取簽訂合同方式參加，聯邦政府只站在輔助立場，絕不強迫。許多簽約的各州都自動展開預期的工作，尚未簽約的州亦紛紛申請訂約中。美國民防當局在開始此工作之初，也遭到「共黨左傾份子及所謂個人自由主義人士的反對」，但因為他們的手法溫和，減少了許多反對力量，「使得共產黨一套組織滲透，思想分化的陰謀，受到相當的打擊」。[102]

但是十三年後王昇再度訪美時，對美國的反共運動卻不再有過去的信心。原來 1968 年王昇訪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時，親眼目睹哥大學生鬧學潮，王昇與陪同人員差點被擋駕在門外。王昇認為美國民主制度似乎遭到嚴重的考驗：「譬如學潮、黑人暴亂、反越戰等問題，明明有共黨在暗中操縱，但在『個人自由』的前提下，沒有充分犯法的證據，政府既不敢貿然干涉，法律認為這是『不可侵犯的自由』。」王昇以為美國應深切注意「如何有效應付共產黨利用假民主毀滅真民主，利用假自由毀滅真自由的惡毒手段」。他認為美國其實可以引用 1940 年《史密斯法案》（Smith Act of 1940），做為約束共產黨顛覆活動的合法手段。該法案規定任何人若明知或自願獻身於使用暴力或藉暗殺政府官吏的方法，以推翻美國政府，就可以科以刑責。但是多年來法官對該法案的精神與條文解釋常有很大出入，以致美國政府無法對共產黨徒給予應有的裁判。[103]王昇指出：

> 美國的知識份子及領導階層，平時有一種自恃的觀點，即認為民主政治不怕共產黨，因為自由辯論可以分清是非，他們不知道一個團體一個學校一個社會如果一旦有了共產黨，就不可能再有公正和平的自由辯論，更不可能公平的是非存在了，如果這個社會不幸一旦

102 王昇，《訪美散記》，頁 24、25-27。

103 王昇，《訪美紀行》，頁 70-74、156-1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共產黨所控制，那就像今天的中國大陸，一切不堪聞問了。[104]

其實《史密斯法案》被美國人批評為違反美國憲法中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而 1957 年最高法院的判例認為，該法案中所謂「主張暴力推翻政府」，只是一種抽象的說詞，只要未訴諸行動，都不會受到《史密斯法案》的制裁。[105]王昇顯然完全無法認同美國最高法院這樣的裁決。在他看來，美國人對共產黨認識不夠，在共產黨威脅之下，民主制度將遭到嚴重考驗。

五、對美國整體印象與美國政府的期望之比較

臺灣訪客在參訪美國之前，對美國的印象各不相同。例如 1951 年赴美的楊基銓訪美之前，「沒有到過日本以外的國家，對西方世界的美國也毫無所知」。[106]高玉樹自承當年初到美國，是以「鄉下人進城」之心態，「一切都感到新奇」。[107] 1956 年赴美進修的齊邦媛，對美國懷著浪漫的憧憬。她回憶當年：「在戰後喘息初定，中華民國遷來臺灣初期，全省生活都很苦，許多小孩確實沒有上學穿的鞋，夏天的電扇都是奢侈品。美國在太平洋的彼岸，是二次大戰英雄麥克阿瑟和陳納德的家鄉，是個遙遠美麗的夢土。」[108]他們 1950、1960 年代到訪時，正是美國國力與聲望如日中天之際，所以對美國的一切大多懷著欣羨與學習的態度。

也有人訪美前對美國有一些既定的負面想法，不過受邀訪美之後，大大改變了對美國的態度。例如吳魯芹就曾比較他在 1952 年訪美前、後

104 王昇，《訪美紀行》，頁 162。

105 “Smith Act,” *Encyclopedia Americana. Grolier Online*, http://ea.grolier.com/article?id=0360310-00 (accessed October 17, 2010); “Smith Act,”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 Academic Edition*,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549923/Smith-Act (accessed October 17, 2010).

106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頁 220。

107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83。

108 齊邦媛，《巨流河》，頁 3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美國人印象的改變。他敘述就在赴美的飛機上，因機件故障，飛機折返東京，航空公司把乘客安頓在一家設備不錯的旅館裡候命待發。但有一美國商人咆哮，說東京除了帝國飯店，沒他可以住的地方。然而一到美國，他盛氣凌人的優越感就不見了。在西雅圖海關檢查行李時，這位美國商人在海關官員目光之下，竟然噤若寒蟬，低聲下氣地向檢查員解釋：那些確是朋友們的餽贈，決非商品，態度迥然不同了。不只是在臺灣的中國人對美國人在海外倨傲無禮之態度不滿，連其他國家的人也有同感。吳魯芹在華府時，其他來自東南亞的朋友告訴他，他們也覺得有許多到海外的美國客商目空一切，對駐在國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而又不屑學習，臉上帶著大爺有錢、唯我獨尊的表情，有人甚至說他們承襲了當年英國人在殖民地高視闊步的模樣。但是吳魯芹訪美三個多月，與各式不同背景的美國人朝夕相處，生活與共，他覺得「就是這些人，使美國成為美國，就在這些人身上，可以體悟到自由民主的真正涵義」。吳氏在《美國去來》一書中寫道：「我有時懷疑，在海外的美國人，不全能代表美國吧，……我讀過一些美國小說，和很少的一些美國詩歌，在戰前的上海，戰時的昆明，見到到過一些美國人，總覺得眼前的事實，與文學家筆下的人物，大有距離。」[109]

汪彝定 1948 年曾在美國駐臺北總領事館擔任臨時翻譯員，他回憶當時總領事館內本地人的地位很可憐，「洋人的氣焰，中國人的卑躬曲節，完全殖民地倫理狀態」。次年美國總領事館提議讓汪氏改為專任，汪氏拒絕接受，因為他無法忍受洋奴的工作氣氛。1958 年，汪彝定在美國旅行一圈之後，他對美國最大的印象是「這個國家是打不倒的。不僅經濟、軍事力量強大無比，政治、社會、文化，每一方面都非常健全」。[110]

王昇在 1955 年也指出，有許多人一談到美國，就認為「新大陸滿是黃金，只要到了美國，就可以不勞而獲，認為美國人的生活，祇曉得豪華的享受，美國青年的愛好，僅僅是大腿和雙槍，……」。這裡王昇雖

109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1、27-29。

110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頁 96、1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說的是一般臺灣人對美國的觀感，其實就是他在沒有訪美前，對美國社會的印象——富饒、多金、膚淺、粗俗、犯罪、根基不深之文化。訪美回來後，他對美國的印象丕變：「新大陸寶藏雖豐，但美國人的生活，是靠他們過去的奮鬥與創造，以及今天的積極與苦幹所得來的，他們頑的時候是痛快的頑，幹的時候卻拚命的幹，尤其是他們一般青年人，那種守法、負責、謙虛、積極的精神，更值得稱道。」[111]而這些臺灣社會菁英原先對美國人負面印象的描述，正好與其他研究、文獻中所記載的，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人在海外的形象普遍不佳是一致的。[112]

在美國政府相關單位精心安排之下，臺灣訪客在美國參訪的經驗大都美好，雖然他們在美國也有不愉快的經驗。例如楊基銓在華府被兩個衣著整齊的白人騙了相機。桂裕在芝加哥法庭柯克區巡迴法院（Circuit Court of Cook County），被一庭丁嗆聲：「你們臺灣搞得麼樣了？我們每次收入數十元，卻被扣去幾成的稅，拿去幫助外國。」據桂氏的美國友人解釋，該庭丁便是所謂「中西部孤立主義者的面目」。[113]

整體而言，過去他們也許對美國有些負面偏見，但是訪美之後，他們對美國多半抱持正面印象。他們筆下的美國人彬彬有禮，對外國人友善、開放，對陌生人信任，毫無階級觀念，有公德心、守法，勤奮工作，同時努力享受生活；美國雖然物質文明發達，但也重視歷史文物、藝術文化等精神文明；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的民主素養值得臺灣學習。他們也觀察到美國人對家庭、婚姻的重視。美國婦女吃苦耐勞，既要顧家務，還要參與社區義務工作。也有人注意到美國婦女不再以家庭為其唯一安身之處，婦女就業的人數越來越多；不過婦女尚無法享有與男人一樣平等的就業機會。他們對美國鼓勵消費、刺激生產的資本主義原則持保留態度。但一般而言，他們認為美國的自由企業、賦稅政策可以讓每一個人在自由平等的環境裡各自努力，促進社會進步與繁榮。工人受

111 王昇，《訪美散記》，序頁 1、頁 1。

112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Shame on U.S.?”, *Diplomatic History* 24:3, p. 468.

113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頁 232-235；桂裕，《訪美雜記》，頁 38-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工會合法合理保障，不會亦不可能受到資本家不合理不合法的剝削，可以過優裕的生活。他們也對美國社會最後可以消除種族歧視有所期待。

把臺灣訪客所描述出來的美國形象，與當時美國政府對海外宣傳的自我形象對照，相差不算太大。Kenneth Osgood 及 Laura A. Belmonte 兩位學者研究，美國宣傳官員努力塑造美國人的形象是努力工作、負責任、機智的（resourceful）、閱歷豐富的（well-rounded）；美國的政治制度講究自由、平等；在經濟生活方面，強調自由競爭企業、自由的工會、政府有限度的介入，以確保經濟成長與基本福利的國家；個人享有自由與機會，是一「無階級」（classless）的社會；大眾消費創造出社會繁榮與高生活水準；美國人重視家庭，雖然女人也逐漸走出家庭，但是家庭主婦與母親的角色仍然是一般婦女的最愛；種族關係在改善中，美國官員強調少數知名黑人的成就，以應付國外對美國的種族歧視的批評。[114]美國政府之邀訪，讓對美國本來就懷有好感的臺灣菁英，親身體驗美國生活方式；讓原來對美國懷有疑慮或負面印象者，改變觀感，從國家公共外交的角度而言，美國的教育交換活動大致是成功的。

當這些臺灣菁英寫下他們在美國的見聞，他們是在為臺灣讀者進行美國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工作。所謂文化翻譯，是指當不同文化相遇時，一方企圖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另一方的行為。[115]所謂自己的方式，當然是與他們過去的生活經驗有關。在美國短期參訪過程中，他們對於與自己文化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臺灣社會所欠缺的部分特別注意。高玉樹對美國民主政治裡的言論自由、公平選舉、少數服從多數、互相尊重極為嚮往，顯然是與他才剛參加過的臺灣第一次地方自治普選

114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pp. 255-287;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pp. 95-176.

115 文化翻譯原是人類學家Edward Evans-Pritchard最先提出的概念，見Peter Burke, “Cultures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Peter Burke and R. Po-chia Hsi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4), pp. 119-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北市長競選，以次高票落選的切身經驗有相當關係。高氏以本省籍非國民黨政治領袖之身分，長期在國民黨政府壟斷政治資源的時代從政奮鬥。三十多年後他回憶，在傳統中國政治觀念中，只有弱肉強食或成王敗寇，從來沒有聽說過互相尊重。高氏把當年美國講師講的「互相尊重」詮釋成「做人漂亮」（fair play），應該是他對多年來臺灣之選舉文化有感而發。他認為人與人之間，不要仇恨太深，應有度量，互相原諒，寬恕別人，才能團結。而高氏認為臺灣自從舉辦選舉以來，總是多少違背互相尊重的原則，於是糾紛風波不斷。他以為互相尊重有賴候選人「自制節度」，而臺灣的民主政治離美國仍有一段距離。[116]吳魯芹則不厭其煩地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為貴」這些中國傳統觀念，來為臺灣讀者闡釋他所看到落實在美國人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和選舉文化。這些都顯示了他們相當欣賞美國的政治文化，希望臺灣社會學習美國人民的民主文化素養。

林海音、吳魯芹、趙聚鈺、關吉玉、王昇等人對美國人守法、有禮貌、有公德心讚不絕口，就是因為他們普遍認為當時臺灣都市人民的思想與行為，還停留在農業社會時代，稱不上是「近代文明都市」公民的緣故。林海音曾描述美國百貨公司無人看管貨品，任由顧客挑選貨物之後，再自行至付賬臺排隊付賬一事，欣羨之餘，她想到的是：「這件事，咱們可做不到啊，如果咱們的貨物不擺在玻璃櫃裡，如果咱們不是每個攤位都有人死死的看守著，看吧，不但小偷進來了，連衣冠楚楚的女顧客也會拈一兩樣，乘人不備塞在手皮包裡吧？像我在菜場裡看見許多主婦愛偷拿兩棵葱一樣！由此我覺得，許多近代文明都市所具備的物質上的進步，也要人類的公德心跟著『文明』起來，才能配稱啊！」[117]

當然，臺灣訪客也不是對美國制度毫無保留都接受。例如他們對美國核心家庭觀念之下所設計的社會保險制度、退休制度、醫藥健康保險還是有所保留。他們總覺得美國的老人生活孤寂，無法享受兒孫繞膝的

116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84-85。

117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倫之樂是一種遺憾，遠不如中國傳統下的老人生活圓滿。

男女有別，使得臺灣菁英對美國婦女生活的觀察有所差別。大多數男性臺灣訪客筆下的美國婦女生活仍以母親、主婦身分出現。即使如曾虛白已經觀察到家庭已經不再是美國婦女生活的唯一依歸，他竟然認為美國婦女「錢不夠用」，貪戀虛榮、享受是她們外出就業的最主要原因。相形之下，林海音由於自己身為職業婦女，她對筆下的美國婦女，不論是家庭主婦或單身職業婦女，都多了一點同情與理解。另外，高玉樹及王昇則都對美國社會鼓勵消費、刺激生產的做法非常不以為然。

出身背景不同，也造成臺灣訪客對他們的美國經驗產生不同的解讀。本省籍菁英高玉樹沒有經歷過大陸的國共內戰與學生示威活動不斷的不安局面，使他對言論自由及勞工罷工問題之看法與其他臺灣訪客態度截然不同。高氏顯然非常心儀當年美國講師告訴他美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運作原則：美國沒有言論自由限制，雖是反共國家，只要沒有違法行動，宣傳共產主義不算犯法；美國勞工為分享資本家利潤而進行罷工是例行常事，不會被視為「圖謀不軌」。相較之下，王昇、吳魯芹、曾虛白等人對勞工及黑人問題的關心，固然因為這些都是美國社會的重大議題，更重要是由於他們擔心共黨是否介入美國工會運動及黑人民權運動，分化美國。他們都曾經歷過國共內戰，後來隨國民黨政府敗退來到臺灣，所以他們對可能造成社會不安、動亂的學生示威與工人罷工活動極為敏感，總懷疑共黨是這些活動的幕後主使者。所以王昇評論美國的學生運動時表示：「在我們深受共產黨之禍的中國人看來，不是共產黨起碼也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搞的。」[118]王昇甚至還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引用 1940 年的《史密斯法案》來約束共產黨的活動。本省籍與外省籍菁英對美國民主制度運作之所以有不同的評價，就在於他們過去不同的生活經驗。

另外，美國當然希望藉由王昇 1955 年的訪美之行，親眼目睹美國民主政治和軍校、軍事基地的管理及運作，回臺之後能夠讓臺灣政府取消

118 王昇，《訪美紀行》，頁 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蘇聯學來的政工制度。[119]然而，王昇參訪回來的印象竟然是：「有些人認為美國軍隊裡沒有政治部的設置，就沒有軍隊政工，殊不知美軍中的編制，系統，作業方式容有不同，而實際上，在他們軍隊裡面的新聞、教育、監察、反情報、軍政府、特勤等業務，其原理與實質則並無二致。」[120]王昇得到這樣一個結論，顯然是為臺灣政工制度之存在辯護。對國民黨政府官員而言，軍中必須有專門從事思想訓練的政工人員，因為與中共的戰爭就是一場思想戰，沒有思想訓練的部隊將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必然無法應付思想訓練有素的中共軍隊。過去在大陸，曾受過思想訓練的國軍將領尚且會變節，更何況受過良好教育的兵士如鳳毛麟角。例如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陳誠針對美國批評我國政工制度一事，就認為學習美國要先衡量自身情況，「模仿，應以能模仿者為度，不可強不能以為能」。[121]在美國顧問團的強力要求之下，蔣經國將國軍的政治訓練占全部操課訓練時數的比例，由 25%降為 10%。也許蔣經國的妥協態度讓美國並未堅持以改變政工制度做為軍援與否的條件，而國軍政工制度始終屹立不動。[122]可見對於攸關國家安全的國軍制度，臺灣也是有選擇性地學習美國的制度。

不過，正因為臺灣訪客觀察美國受到自己過去的文化、社會經驗的影響，他們解讀美國文化，難免產生曲解。柏克（Peter Burke）指出，文化翻譯是一種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和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雙重過程；在選擇翻譯的過程中，有一種證實原則（principle of confirmation），即接受方會選擇翻譯一些支持接受方

119 美國人批評政工制度過度灌輸政治思想，施加政治控制，會對青年軍官產生不利影響，製造不安全感，破壞每一階層指揮官的權威。陶涵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頁 230-234、237。

120 王昇，《訪美散記》，序頁 1、頁 64。

121 陳誠，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2005），頁 268-274。

122 陶涵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頁 2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化中已有的概念、假設或偏見。[123]例如趙聚鈺詮釋美國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在《訪美見聞》中，歸納出美國人表現在日常生活裡有「五守」精神——守時、守分、守法、守信、守密，「是美國的地大物博，與民主、科學精神充分發揚的原動力」。這五守精神原是蔣中正總統在 1963 年提出來要求「革命黨員的精神革新和生活革新的基本條件」，不久「五守」變成國內青年自覺運動要實踐的目標之一。[124]其中「守密」部分，原來蔣中正是要求國民黨「新聞從業同志，尤其要為保護黨的利益，對輿論與報導特別鄭重審慎，須知守密就是對自己負責，亦即對革命負責的起點」，趙氏則以他在訪美期間聽來一則有關美國媒體在 1962 年古巴飛彈危機時，為政府守密的故事，來詮釋「守密」的精神。當時美蘇對峙，美國輿論一致要求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 1917-1963）強硬對付，甘迺迪表面上相應不理，仍對赫魯雪夫大做親善外交，白宮還一再發布新聞說明美蘇關係友好。其實甘迺迪早已下令陸海空三軍向佛羅里達集中，飛彈、大炮、軍艦日夜不停趕往邁阿密海灘，但媒體完全沒有洩露這些軍事行動。後來赫魯雪夫見甘迺迪不惜一戰，趕緊下令自古巴撤走蘇俄飛彈，美蘇大戰危機才解除。事後有美國人批評甘迺迪總統不應故意發布煙幕新聞，讓美國人民不辨真相。趙聚鈺卻從此事看到當時美國媒體配合政府，是美國人「重視自己國家的利害關係」。[125]

趙氏原意是要引用美國古巴飛彈危機事件的例子，來支持蔣中正要

123 Peter Burke, “Cultures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 9-10, 20.

124「五守」原是蔣中正在 1963 年 2 月 25 日國民黨中央擴大總理紀念週的訓詞。其後不久，1963 年 5 月 18 日，臺大外籍生狄仁華在《中央日報》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一文，批評臺灣社會只講究人情味，不重公德心，臺大學生因此發起「五二〇自覺運動」，就以蔣中正不久前提出的「五守」做為實踐公德心的目標。當時活動概況，可參見〈張毓中昨發表談話　讚揚自覺運動〉，《聯合報》，1963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另見薛化元，〈五二〇青年自覺運動〉，收入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155。

125 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216-2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求臺灣媒體配合政府與國民黨政策，甚至強調蔣氏要求媒體為政府守密的正當性。其實媒體在現代民主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監督政府、揭發弊案，絕非配合政府「守密」。可見趙聚鈺與蔣中正一樣，他們在乎的是媒體配合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媒體監督政府的功能。

令人驚訝的是，不少臺灣訪客對於美國種族問題的無知與種族偏見。他們的見聞錄幾乎對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視而不見。雖然美國政府並未刻意隱瞞，但在他們的參訪過程中，相當多行程是經過事先聯絡或有人陪同，無法體會到非裔美國人的處境。只有楊基銓與吳魯芹親身遇上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之情形，而幸運的是，楊氏當時被當成白人。大多數臺灣菁英過去在國內生活，應該少有與不同種族共處的經驗，他們原來想像中的美國，就是白人的美國，所以來到美國之後，就自然採取白人角度來看問題，認為黑人問題是文化、教育問題。只有曾虛白基於新聞記者平衡報導的職業訓練，在見聞錄中提供臺灣讀者從黑人角度來看待美國種族問題。

六、結論

在冷戰時代，美國與蘇聯在全世界的爭霸戰，不只是以競相建造坦克、槍砲、原子彈等方式進行，它還以美國軟實力（soft power）——即美國的理念、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生活方式、價值觀等，吸引其他國家的人民，使他國人民心悅誠服地效法美國，追隨美國的領導，阻止共產勢力向外擴張。[126]美國在二次大戰以後所發展出來與世界各國（包括共產國家在內）進行的各種教育交換活動，實為傳遞、推銷美國理念、價值與生活方式的工具之一。美國政府在臺灣進行的教育交換計

126 軟實力指讓其他國家羨慕其價值觀而想效法，渴望其繁榮及開放程度而想追隨，讓他人欲己之所欲。軟實力建立在塑造他人喜好之能力之上。見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5. 事實上，這本書中提到的實證例子，多是引用近年來歷史學者討論美國冷戰時期文化外交之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畫，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產生的活動。美國希望改造臺灣的政府成為一個「民主、親美」的中國政府，使臺灣成為「一個東亞民主政治的櫥窗」（a showcase of democracy in East Asia），來展示「自由世界的優越性」。[127]

自從國民黨政府在 1949 年遷臺以來，美國是臺灣最重要的盟邦。美國在國際舞臺上提供的政治支持與軍事協助，讓臺灣渡過風雨飄搖的年代，美援也為日後臺灣經濟起飛提供相當大的助力。國民黨政府剛從國共內戰敗退下來，驚魂甫定，從上到下也努力向美國學習富強之道，以期有朝一日可以反攻大陸。1950、1960 年代是臺灣的社會、文化、教育、政治、軍事、學術各層面經歷了一個美國化的年代。在那個時代，美國在臺灣人心目中是許多事物的參考點（point of reference）、衡量的標準（yardstick）與對比（counterpoint）的對象。美國文化是當時臺灣最具影響力的外國文化。造成這個現象，固然是因為臺灣社會從上到下努力學習美國富強之道，同時也是美國政府努力在臺灣推銷美國文化的結果。

本研究所討論的教育交換，以 1950、1960 年代 14 人應美國政府邀請赴美短期訪問後所留下的見聞錄，來探討他們建構出來的美國形象。這 4 人當中，有政府官員、作家、中學教師、大學教授、媒體記者、軍官、國民黨高層官員，其中有 2 位半本省籍，11 位半外省籍。這些人都是經過美國政府挑選的臺灣社會菁英或意見領袖，美國政府期望他們對美國生活方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有所了解，在回國以後，不但可以在臺灣實踐美國的理念、價值，亦可以把美國文化、價值傳達給臺灣人民。他們的見聞錄在成書之前，多以單篇形式先發表於報刊、雜誌，或以演講、廣播方式公開表達過。

127 “Education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Fiscal Year 1958,” Taipei Desp.49, July 29, 1958,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Revised Annual Program Proposal of the USEF/C for the Program Year 1963,” April 11, 1962, Folder 116, Box 9, ibid.; “Revised Annual Program Proposal of the USEF/C for the Program Year 1964,” November 14, 1962, ibi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公共外交而言，美國政府之邀訪大致是成功的。把臺灣受邀菁英所描述出來的美國形象，與當時美國政府對海外宣傳的自我形象對照，差異不多。臺灣訪客也許過去對美國印象懷有好感或惡感，參訪回來之後，多半對美國富而好禮印象深刻。他們把美國民主政治看成是臺灣應學習的對象。他們雖然不見得認同美國以消費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但大多認為美國政府的賦稅與福利政策，已經保證美國的資本主義不致造成貧富不均的社會。他們多半認為美國人重視家庭，美國婦女吃苦耐勞，內外兼顧，不過年輕婦女已經不再以身為家庭主婦與母親為滿足。

從文化解讀的角度來看，這十四人正是美國向臺灣傳輸美國文化的媒介人物。臺灣訪客觀察美國，受到他們自己過去的文化、經驗的影響。例如本省籍的高玉樹，顯然可以接受勞工罷工是民主社會中勞工爭取權益的例行常事。外省籍人士則根據他們過去在大陸與共黨打交道的經驗，對共黨可能介入美國工會運動與黑人民權運動、學生反戰運動之事頗為憂心。臺灣訪客因為性別不同，觀察美國家庭與婦女的角度也不同，於是產生了不同的看法。臺灣訪客對美國的想像多是白人統治下的美國，他們自然泰半採取白人角度來看待美國種族問題。不過，美國人原來期待王昇參訪美國軍事基地與軍事學校之後，可能會改變他對臺灣政工制度的看法；但美國人一定沒料到王昇參訪之後，反而認為美國制度也有類似臺灣國軍的政工制度，這個發現可能也加強國民黨政府反抗美軍顧問團施壓廢除政工制度之決心。趙聚鈺對古巴危機時美國媒體為政府守密之曲解，恐怕也不是美國政府所能逆料得到的。

本文所探討 1950 及 1960 年代美國政府透過「教育交換」，邀請臺灣菁英訪美，來傳播、宣傳美國制度、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等活動，雖然是冷戰時期美國企圖改造臺灣成為一個「民主、親美」的中國的過程之一部分，我們無法確定它與日後臺灣民主化有直接關係，卻也不能否認他們所建構的美國形象，可能對當時尚無法自由出國觀光的大多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人民產生影響。[128]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臺灣菁英各自解讀的美國形象固然大多是正面的，但正如近年來其他討論美國向海外輸出美國文化的研究所顯示：美國政府向臺灣菁英傳播美國文化，不一定百分之百立刻達到目的，文化的傳輸還是要經過不斷的溝通與妥協。

*本文撰寫期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淑雅、余敏玲兩位教授惠賜修改建議，並潤飾文字；出版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惟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責任編輯：劉昱妤　校對：蘇婉婷　蘇聖雄）

128 1979 年臺灣政府才開放人民出國觀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以下依照赴美參訪的時間先後，簡單介紹本研究採用的十四位訪美經驗之紀錄內容。

（一）高玉樹（1913-2005）

高玉樹乃非國民黨、受日本教育的臺灣省籍菁英分子，曾參加 1951 年臺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選舉，以第二高票落選。不久，高氏考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招考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美援計畫下工程部門的技術人員，1951 年赴美進修一年。他先在美國國家標準局及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冶金技術，後又參加工業經營講習。回國之後，高玉樹經美援計畫的懷特（J. G. White）技術顧問工程公司推薦，出任聯勤第四十四兵工廠技術顧問；1954 年當選第二屆民選臺北市長。1964 年再參選臺北市長選舉，並當選第五屆臺北市長。1967 年到 1972 年，高氏被派為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的第一任市長。卸任之後，旋即入閣，擔任交通部長四年。他在 1989 年出任總統府資政，1990 年擔任國統會副主委。

高玉樹在 2001 年出版的旅遊文集，以及 2007 年出版的口述回憶錄中，都記下他在 1951 年赴美國受訓的印象。他當年特別留心觀察美國的民主政治運作，發現很多地方可資臺灣借鏡。除了每天花時間比較研究各黨派的報章雜誌外，他也收聽電臺廣播。他在美國的時候，正逢 1952 年美國總統大選，親眼目睹二次大戰時歐洲聯軍統帥艾森豪取代了原來呼聲很高的參議員塔虎脫（Robert Taft, 1889-1953），代表共和黨競爭白宮主人的過程。這個選舉故事讓高氏印象深刻，他「決定要以政治為業，回臺北要積極準備投入下一屆的市長選舉」。高氏還與當時同時考取赴美受訓，並在華府賃屋同居兩月的楊基銓，約定成為未來競選臺北市長時的合作夥伴。[129]

129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旅遊文集下》，頁 103、83-96、319-320；高玉樹口述，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頁 57-59。該次錄取 36 人中，有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楊基銓（1918-2004）

與高玉樹同時考取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美援計畫下赴美進修的楊基銓，出身臺灣清水世家大族，是受日本教育的臺灣省籍菁英分子，1940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他在大三時就參加日本政府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試合格，畢業後分發到拓務省任屬官，半年後奉命轉到臺灣總督府任職。楊氏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就已擔任臺灣總督府財務局、宜蘭郡守。1945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之後，他以日本總督府施政官身分，負責接待來臺接收的國民政府人員。楊氏以後出任臺北市政府秘書，後調任財政局財產課長兼市政府秘書。1947 年，應臺灣省政府農林廳長徐慶鐘之邀，轉任水產科長，從此開啟他與臺灣水產界的密切關係。楊氏在 1952 年赴美研習水產行政一年，回臺之後改任省府參議，不久又兼漁增會專門委員及漁業指導聯絡小組組長，後來又兼任美國駐華安全分署技正，再轉任農復會技正。在前後近十七年裡，楊氏的工作重心都是漁業，從負責漁業統計，擬定漁業四年計畫，推動遠洋鮪釣漁業，發展巾著網漁業等等。1969 年楊氏應臺北市長高玉樹之邀，擔任臺北市政府建設局長。1972年楊氏應經濟部長孫運璿之邀，出任該部常務次長，主管農漁經濟。楊氏當年到美的研習生活，記載在他 1993 年撰寫的回憶錄《楊基銓回憶錄：心中有主常懷恩》。

（三）吳魯芹（1918-1983）

吳魯芹本名吳鴻藻，字魯芹，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大學、淡江大學、政治大學。吳氏在 1956 年與夏濟安、林以亮、劉守宜等人聯合創辦《文學雜誌》。1962 年以客座教授身分赴美國，[130]曾在紐約州立大

少人日後成為臺灣知名人士。例如農業經濟的李登輝，後成為中華民國總統，水產部門的楊基銓做到經濟部次長，公共衛生部門的許子秋日後曾任衛生署長，江萬煊出任臺北醫學院院長，陳拱北擔任臺大公共衛生試驗所所長。

130 吳魯芹在 1962 年又再以傅爾布萊特交換教授名義赴美，見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n Years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p. 55, 不過未見到他撰寫二度赴美的見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西密西根州立大學、布納德萊大學、費萊狄金遜大學、羅德州立大學、密蘇里大學講授比較文學，後任職於美國新聞總署。他在 1952 年 5 月應國務院邀請，赴美進行三個月參訪，回國之後寫了《美國去來》一書記載訪美感想，是本研究所引用的資料。

（四）曾虛白（1895-1994）

曾虛白原名曾燾，字煦白，筆名虛白，是 1950 及 1960 年代臺灣新聞界名人。他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3 年 9 月至 1954 年 1 月，他是以中央通訊社社長身分應美國國務院之請，赴美考察四個月。1954 年 7 月，曾氏改任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次年任政治大學新聞系系主任。美國駐華官員顯然看中了曾氏在媒體界的影響力，因為曾虛白透過他所主管的報紙和廣播，可以影響非常多的公眾。[131]曾虛白在紐約就被「美國之音」邀請，去錄製了一次廣播節目，發表他遊美的觀感。作為美國國外宣傳喉舌的「美國之音」，很可能把該訪問節目向東南亞華人社會和中國大陸播放。曾氏回臺之後，也曾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紀念週報告「美國生產社會現況」，在中國廣播公司月會中報告美國的電視事業。稍後曾虛白把他訪美經過寫成《東遊散記：遊美見聞錄》，在 1954 年由美國政府資助的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

（五）王昇（1917-2001）

王昇是蔣經國的親信，被稱為是「太子系」人馬。他正是為蔣經國建立臺灣國軍政工制度，長期從事軍中政治作戰、心理、思想戰的核心人物。[132]他曾在 1955 年及 1968 年兩次應邀赴美訪問，回來之後分別出版《訪美散記》（1956）、《訪美紀行》（1969）兩本書，記錄他訪美的經

131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Desp.438, February 2, 1954, 511.94a3/22-254, Folder, 25, Box 316, CU Records.

132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 221-2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王昇第一次應邀訪美時，正是他任職政工幹部學校教育長時期，同時受邀訪美的還有政工幹部學校校長王永樹。美方的用意顯然與邀請蔣經國一樣，希望王昇能到美國親眼目睹美國民主政治和軍校、軍事基地運作，讓國軍的運作更接近美軍的模式。[133]王昇第二次應邀訪美是在 1968 年 4 月，乃是以越南問題、中共問題專家身分，受邀到美國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及美國各知名大學與中國問題學者專家進行座談會，交換彼此對越南及中國大陸局勢之看法。此次赴美參訪，正值美國國內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如火如荼地在全美展開，王昇在他的《訪美紀行》中有不少篇幅記下他的觀察與感想。

（六）齊邦媛（1924-）

齊邦媛是臺灣著名英美文學學者、文學評論家，也是將臺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介紹至西方世界的重要推手。齊氏在 1947 年武漢大學畢業後，就渡海到臺灣大學擔任外文系助教。自 1953 年起任教臺中一中英語教師。在 1956 年時首次以臺中一中英語教員身分，獲得國務院交換教員計畫補助，前往美國進修英語教學一學期並旅行訪問半年。1958 年秋，轉至臺灣省立農學院（即後來的中興大學）任教，同時在靜宜文理學院教授美國文學，東海大學外文系教授翻譯。1967 年再度申請到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的旅費與書籍補助一年，赴美在印第安那大學進修比較文學，並在附近天主教樹林的聖瑪麗學院（St. Mary-of-the-Woods College）教授中國現代文學課程。她在 1969 年返臺，回中興大學，擔任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並於次年在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及中文研究所兼授高級英文。1977 年回臺大外文系專任，直到 1988 年退休。齊氏在 1972 年應邀到國立編譯館擔任人文社會組主任，負責主持中書外譯的計畫，讓臺

133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頁 212、321-322。沈錡，〈隨經國先生訪美記（一）〉，《傳記文學》第 65 卷第 6 期（1994 年 12 月），頁 16；〈隨經國先生訪美記（三）〉，《傳記文學》第 66 卷第 2 期（1995 年 2 月），頁 42；Nancy B.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 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文學在國外發聲，開啟了齊氏在教學與研究之外另一個重要事業。1975年，她所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92 到 1999 年擔任中國筆會季刊（*Chinese PEN Quarterly*）總編輯；1997 年與王德威合作，開始主編英譯一系列臺灣文學作品（*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1999 年主編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的《中英對照臺灣小說 *Taiw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2000 年再與王德威主編英文版《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文文學》論文集，由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出版。她兩次赴美進行交換教學的印象，寫在她 2009 年出版的回憶錄《巨流河》一書中。她第一次訪美經過尤其珍貴，是目前找到唯一以中學英語教師身分赴美的紀錄。[134]

（七）桂裕（1902-2002）

桂裕任教於臺灣大學，是臺灣著名法學學者，專長是海商法、保險法。1946 年曾被國民黨政府派往日本，擔任遠東國際法庭中國檢察官之顧問。他在 1957 年底到 1958 年初接受美國駐華大使藍欽邀請，以「領袖」專案邀訪人員身分，赴美訪問一個半月。桂裕把他的美國之旅寫成了《訪美雜記》。[135]

（八）汪彝定（1920-1993）

汪彝定在 1970 年到 1981 年為臺灣國際貿易局局長，是負責主持臺灣對外各項經貿談判的重要領導人物。汪氏善於貿易管理、斡旋談判、協助業者爭取出口配額，使得臺灣的外貿能穩定成長。1977 年，汪彝定偕同當時國貿局副局長蕭萬長赴美，進行台美斷交前的最後一場貿易談判，爭取我輸美彩視配額以及日後在美國的最惠國待遇（MFN）。也正

134 齊邦媛，《巨流河》，頁 355-358、370-383、592-597。

135 桂裕，《訪美雜記》，頁 1-3。桂裕以後在 1962-1963 又取得傅爾布萊特交換教授名義赴美，但未見他後來再出書記錄後來的赴美見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這次談判所簽的這紙協議，維繫了當年占臺灣出口商品 40%的美國市場。[136]汪氏在 1948 年時曾在任職救濟總署臺灣分署視察之同時，兼任美國駐臺北總領事館的臨時譯員。1958 年，汪氏在臺灣省煤業調節委員會總經理任內，接到美國駐華大使館邀請，提名他為國務院「領袖」，赴美訪問。他在 1991 年出版的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中，記述了他當年赴美參訪的感想，篇幅不多，卻有一些獨特的觀察。

（九）關吉玉（1899-1975）

關吉玉乃國民黨政府遷臺前後財經界名人，來臺後曾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中央信託局理事會主席，1950 年調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兼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 年轉任高雄硫酸錏公司董事長，後來調任考試院秘書長（1958-1966）。關氏卸任之後，任教於政治大學，並在逢甲學院財稅系擔任系主任，1975 年創辦中西醫院。[137]關氏在 1959 年 6 月考試院秘書長任內，應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 1958-1962）代表國務院邀請，赴美國訪問六十天，訪問的重點主要在美國財政、稅務、金融、工業及一般經濟情形。回來後不久，他就出版《訪美見聞》。[138]

（十）陳紀瀅（1908-1997）

陳紀瀅是臺灣知名作家，文壇重要領導人物之一。在大陸時期，曾擔任《大公報》記者與副刊主編，後來當選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來

136 于國欽，〈做大事，不做大官　汪彝定了不起的抉擇〉，《工商時報》，2010 年 4 月 19 日，A4 版。

137 關吉玉經歷參見考試院院史主題網站，http://www.exam.gov.tw/lp.asp?CtNode=844&CtUnit =238&BaseDSD=58&mp=10&x（2010 年 9 月 20 日讀取）；〈系所沿革〉，《逢甲大學財稅學系》，http://www.pf.fcu.edu.tw/wSite/ct?xItem=13120&ctNode=1430&mp=430101（2011 年 11 月 10 日讀取）。

138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Desp.102, August 23, 1960, Subject: Education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Fiscal Year 1960,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之後，1950 年與國民黨的張道藩等人共同組織「中國文藝協會」，擔任該協會常務理事 25 年，乃該組織的實質領導人。該會成員包括臺灣作家、各報紙副刊雜誌編輯、藝術界、影劇界人士。陳紀瀅不但在 1950 年代臺灣積極推動反共文藝運動，他自己也是一個多產作家，其作品有小說、雜文、傳記，他的評論文章散見各報章雜誌。[139]他在 1961 年 12 月中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請，以「專家」身分赴美參訪七個月。陳氏在 1965 年出版了《美國訪問》上、中、下三冊。該書鉅細靡遺記錄他參訪行程與經過，其中第二章「怎樣邀請和怎樣接待客人」對於美國國務院如何處理專家與領袖接待之方式，有非常詳盡的描述，可以用來比對英文文獻的記載。該書鮮少直接評論美國的事務，但在文筆之中，仍可清楚顯示其對美國之好感。

（十一）林海音（1918-2001）

林海音是臺灣著名女作家，原籍臺灣苗栗，出生日本大阪，成長於北平，戰後才回臺灣，算是一半臺灣人、一半外省人。她曾任《國語日報》編輯，在 1953 年起任《聯合報》副刊主編，1957 年兼任《文星》雜誌的編輯，曾經提拔了不少臺灣本土作家，1963 年 4 月因「船長事件」離開《聯合報》。[140] 1965 年 4 月，她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訪問四個月。美國政府邀請她，可能在於她的作家與出版家身分。林氏訪美除了一般訪問之外，還向美方提出三個訪問目標：一、訪問在美的中美作家；二、訪問美國婦女及家庭；三、調查美國兒童讀物。回臺後，她陸續將在美國的見聞寫成文章，分別在各報章雜誌刊載，然後在 1966

139 簡弘毅，〈陳紀瀅〉，《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 content?ID=4593；黃怡菁，〈陳紀瀅〉，《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http://taiwanpedia. culture.tw/web/content?ID=7703（2010 年 9 月 20 日讀取）。

140 所謂「船長事件」是指 1963 年 4 月 23 日《聯合報》副刊登出筆名「風遲」的一首詩，敘述一個船長漂流到一座小島，被島上美女吸引而流連忘返。臺灣政府認為有「影射總統愚昧無知」之嫌。林氏立刻請辭聯副主編一職，以免報社及她自己招惹麻煩。見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0），頁 181-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由文星書店結集出版為《作客美國》一書。十七年後，作者增加了一些當年的照片，由遊目族文化出版社重排出版。[141]

（十二）侯斌彥（1911-?）

侯斌彥是臺灣南部知名新聞界人士。他曾在 1949 年至 1950 年 11 月任公營《高雄新生報》南部版分社主任，以後又曾擔任國民黨經營的《中華日報》南部版主任，1964 年起，又再接任《新生報》南部版改組而成的臺灣新聞報社社長，一直到 1976 年退休。[142]侯氏是在 1966 年 5 月以高雄臺灣新聞社社長身分，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訪問兩個月，回來後出版《美國行》，報導他在美國參訪經過。

（十三）趙聚鈺（1909-1981）

趙聚鈺乃臺灣財金、保險界重要人物，1964 年以後致力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業務之發展。趙氏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工商管理系，1945 年任職中央信託局，1949 年年初，趙氏在上海協助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搶運黃金到臺灣，這是國民黨政府日後在臺灣發展的重要資金。來臺之初，趙氏調任中央信託局臺灣一等分局經理，負責將中信局人員及外匯轉運臺灣。他還另兼中央銀行駐臺灣副代表，處理該行存臺物資。趙氏頗得蔣經國之信任，在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經理任內（1949-1959），建立軍人保險、國民黨黨務工作人員保險，並規劃及推動公務人員保險，邁出臺灣社會安全制度之第一步。他在 1956 年又兼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秘書長。1959 年趙氏辭去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經理，改任該局顧問。1964 年升任退輔會主任委員，此後到他 1981 年過

141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251-252。臺北遊目族文化在 2000 年出版《林海音作品集》，其中收錄《作客美國》。經過比對，遊目族文化版少了〈購買，享受，公德心〉一章，所以本研究使用較早的文星版。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頁 152、161、167-171、200-213。

142 侯斌彥，〈半生筆墨，至老才休〉，收入鄧伯宸編，《不惑的歲月：臺灣新聞報創刊 40 週年紀念特刊》（高雄：臺灣新聞報社，1989），頁 29-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期間，趙氏一直主持退輔會工作。[143]他是在 1967 年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應美國政府邀請，赴美訪問一個多月，主要考察美國退伍軍人輔導制度、社會安全制度。趙氏在訪美回國後，寫了一本《訪美見聞》，書中除了上述兩種制度之外，對美國財經現況、政治制度以及教育設施、交通建設、證券管理等方面都有觀察。

（十四）葉昌桐（1928-）

葉昌桐上將曾任海軍總司令、三軍大學校長、總統府戰略顧問。1949 年葉氏自海軍軍官學校畢業後，進入海軍基層服務，曾先後擔任維源、中明、太康、南陽艦長，歷經撤退舟山駐軍（1950）、九三砲戰（1954）、大陳撤退（1955）、八二三砲戰（1958）等戰役。葉氏自 1978 年擔任國防部計畫參謀次長，開始負責督導中山科學研究院運作，1982 年調陞國防部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時，就兼任中山科學研究院長，一直到 1988 年 6 月葉氏調任海軍總司令，仍續兼中科院長一職將近半年。在這十年間，葉昌桐對中科院發展投入很大心力，他深入參與規劃國防武器裝備研發、採購業務，釐訂「國防科技自主發展」之政策，使中科院研發計畫配合三軍戰備需求，不但大量派員赴美留學研習，並與國內各大學合作，全面提升國防科技整體研發之能力。任職參謀本部期間，葉氏為了促進軍事交流與推動對美國軍購，曾經十二次（其中七次由葉氏率領我軍代表）赴美洽談軍購。1992 年，調任三軍大學校長，1994 年再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五年後自海軍退役。[144]其實早在 1950 年韓戰爆發之後，

143 魏秀梅，《趙聚鈺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1-3、21、44、46、67、115。

144 鄧克雄、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頁 415-432、562-567。2001 年 7 月，臺北地檢署以葉氏在海軍總司令任內執行的獵雷艦造艦案中，包庇下屬侵吞採購款利息一千多萬元，對他提起公訴。2009 年 3 月，案經七年半訴訟，最高法院認定葉昌桐非故意不舉發犯罪，駁回檢察官上訴，判他無罪定讞。參考〈軍購弊案 葉昌桐、雷學明九人起訴〉，《聯合報》，2001 年 7 月 6 日，第 1 版；〈獵雷艦採購案 葉昌桐涉包庇無罪定讞〉，《聯合報》，2009 年 3 月 6 日，第 A8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國第七艦隊巡邏臺灣海峽，葉氏就曾在馬公登上美軍軍艦見習、觀摩。而後在 1950 及 60 年代，葉氏先後四次被選派赴美國受訓、就學，1952 年奉派到關島海軍工廠受訓三個半月，學習艦艇電機系統維修；1955 年赴美國聖地牙哥海軍砲儀學校受訓;1960 年到加州美國海軍研究院(Post Graduate School）的「一般兵科軍官班」進修十一個月；1966 年 7 月赴羅德島州（Rhode Island）的美國海軍大學（Naval War College）之指揮學院（Naval Command College）就讀一年。所以葉氏從本國海軍官校畢業之後，戰技、戰術與戰略進修都是接受美國海軍軍校教育，其中最令他懷念的就是 1966 年他到美國海軍大學指揮學院的三次「參謀旅行」。葉氏的口述史稿在 2010 年由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出版。[145]

145 鄧克雄、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頁 68、70-72、97-101、125-148、555-556。葉氏在 1974 年 3 月擔任總統府第三局副局長之時，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以「國際賓客訪問計畫」（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訪問美國中西部農村五週，見《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頁 244-2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外交部北美司檔案。臺北：北投外交部檔案庫。

〈系所沿革〉，《逢甲大學財稅學系網站》，http://www.pf.fcu.edu.tw/wSite/ct?xItem=13120&ctNode=1430&mp=430101&idPath=1409_1430，2011 年 11 月 10 日讀取。

〈張毓中昨發表談話　讚揚自覺運動〉，《聯合報》，1963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

〈軍購弊案　葉昌桐、雷學明九人起訴〉，《聯合報》，2001 年 7 月 6 日，第 1 版。

〈獵雷艦採購案　葉昌桐涉包庇無罪定讞〉，《聯合報》，2009 年 3 月 6 日，第 A8 版。

丁瑞鈇，《懷恩感舊錄》。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6。

于國欽，〈做大事，不做大官　汪彝定　了不起的抉擇〉，《工商時報》，2010 年 4 月 19 日，A4 版。

王　昇，《訪美散記》。臺北：青年戰士報社，1956。

王　昇，《訪美紀行》。臺北：中華日報社，1970 第四版。

吳魯芹，《美國去來》。臺北：中興文學出版社，1953。

沈　錡，〈隨經國先生訪美記（一）～（五）〉，《傳記文學》第 65 卷第 6 期至第 66 卷第 4 期，1994 年 12 月至 1995 年 4 月，臺北。後收入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文化，1991。

林海音，《作客美國》。臺北：文星書店，1966。

侯斌彥，《美國行》。高雄：臺灣新聞報社，1966。

侯斌彥，〈半生筆墨，至老才休〉，收入鄧伯宸編，《不惑的歲月：臺灣新聞報創刊 40 週年紀念特刊》。高雄：臺灣新聞報社，1989。

桂　裕，《訪美雜記》。臺北：桂裕，1959 改訂版。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臺北：臺灣東方出版社，2001。

高玉樹口述，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陳　誠，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2005。

陳紀瀅，《美國訪問》。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65。

曾虛白，《東遊散記：遊美見聞錄》。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黃怡菁，〈陳紀瀅〉，《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7703，2010 年 9 月 20 日讀取。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心中有主常懷恩》。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葉　曙，《病理卅三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再版。

趙聚鈺，《訪美見聞》。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

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鄧克雄、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
簡弘毅，〈陳紀瀅〉，《臺灣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4593，2010 年 9 月 20 日讀取。
魏秀梅，《趙聚鈺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關吉玉，《訪美見聞》。臺北：經濟研究社，1960，再版。
The Historical Collection of the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1938-1984. University of Arkansas Libraries, Fayetteville, A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 14, pt. 1, U.S.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cgi-bin/FRUS/FRUS-idx?type=gallery&entity=FRUS.FRUS195254v14p1.p0281&id=FRUS.FRUS195254v14p1&posn=curr&curr=FRUS.FRUS195254v14p1.p0281&isize=M&q1=251 (accessed March 10, 2009).

二、近人著作

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臺北：自立晚報社，1990。
司馬嘯青，《臺灣企業家的美國經驗》。臺北：玉山社，2002。
尼 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
吳聰敏，〈美援與臺灣的經濟發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88，臺北，頁 145-158。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0。
郭文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一九六〇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2 期，1998 年 12 月，臺北，頁 39-82。
陶 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2000。
傅建中，〈蔣經國會晤杜勒的插曲〉，《傳記文學》第 66 卷第 4 期，1995 年 4 月，臺北，頁 81-82。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收入氏著，《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出版社，2009。
楊翠華，〈美援技術援助：戰後臺灣工業化開端的一個側面〉，收入陳永發主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楊翠華，〈美援對台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 期，2008，臺北，頁 91-139。
雷 穎，《造化遊戲四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歐美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第 31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臺北，頁 79-127。

薛化元，〈五二〇青年自覺運動〉，收入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Armstrong, Charles K.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Korea, 1945-195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1, February 2003, Ann Arbor, pp. 71-99.

Belmonte, Laura. A.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Bu, Liping.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3:3, December 1999, London.

Bu, Liping. *Making the World Like Us: Education, Cultural Expansio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Burke, Peter.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4.

Burke, Peter, and R. Po-chia Hsia eds.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oombs, Philip H.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4.

Cull, Nicholas J.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Frankel, Charles.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Abroa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6.

Frey, Marc. “Tools of Empire: Persuas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s Modernizing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 *Diplomatic History* 27:4, September 2003, Malden, pp. 543-568.

Fried, Richard M. “1950-1960.” In *A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America*. Edited by Stephen J. Whitfield.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Gienow-Hecht, Jessica C. E. “Shame on U.S.? Academic, Cultural Transfer, 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 *Diplomatic History* 24:3, Summer 2000, Malden, pp. 456-494.

Kroes, Rob. “American Empire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A View from the Receiving End.” *Diplomatic History* 23:3, Summer 1999, Malden, pp. 463-477.

Latham, Michael E.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Long, S. R. Joey.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U.S.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in Singapore, 1955-1961.” *Diplomatic History* 32:5, November 2008, Malden, pp. 899-930.

Ninkovich, Frank A.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96.

Nye, Joseph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4.

Osgood, Kenneth.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Pells, Richard. *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Richmond, Yale.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senberg, Emily S. "Consuming Women: Images of Americanizatio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23:3, 1999, Malden, pp.479-497.

Scott-Smith, Giles. *Networks of Empire: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Foreign Leader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 France, and Britain, 1950-70*. Brussels: Peter Lang, 2008.

Simon, Denis Fred. "External Incorporation and Internal Reform." In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Edited by Edward A.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

Thomson, Charles A., and Walter H. C.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3.

Tucker, Nancy B.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n Years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Taipei: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67.

Yarrow, Andrew L. "Selling a New Vision of America to the World: Changing Messages in Early U.S. Cold War Print Propagand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1:4, Fall 2009, Cambridge, MA, pp. 3-45.

Wagnleitner, Reinhold. *Coca-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ustri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48 (Dec. 2011), pp. 97-163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bserving America: American Images in Taiwan Elites' Writings and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1950-1970

Chao, Ena*

Abstract

Some three thousand Taiwanese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various U.S.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from 1951 through 1970. These programs were aimed at promoting knowledge and confidence 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mong people in Taiwan. Many people wrote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during and after their visits, some accounts even got published. The U.S. Government expected that Taiwanese "leaders" or "experts" would come to understand "American way of life" by their visits and that through their writings and speeches they would publicize their exper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ong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terms of public diplomacy, the educational exchange practice worked well for the U.S. Government. Many Taiwanese visitors had positive images of America from their visits and their images of America were similar to the self-images of the US that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officials promoted overseas. But, Taiwanese visitors viewed American society through the refracting lenses of their own cultures and of their own immediate purposes.

Keywords: Educational exchange, Cold war, US public diplomacy, US-Taiwan relations.

* Assoic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E-mail: enachao@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